

学校代码: 10730

分类号: F832.5

密级: 公开

兰州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学术学位)

论文题目 (中文)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论文题目 (外文) Study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作者姓名 拜珊珊

学科专业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研究方向 金融市场运行管理

教育类型 学历教育

指导教师 杨肃昌 教授

合作导师

论文工作时段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22 年 5 月

校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 222 号

学 院：经济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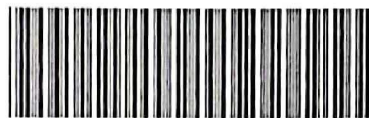
学 号：220190923300

学生姓名：拜珊珊

导师姓名：杨肃昌

学科名称：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论文题目：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学位论文中凡引用他人已经发表或未发表的成果、数据、观点等，均已明确注明出处。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拜珊珊

日 期：2022.5.31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在导师指导下所完成的论文及相关的职务作品，知识产权归属兰州大学。本人完全了解兰州大学有关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存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兰州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任何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本人离校后发表、使用学位论文或与该论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成果时，第一署名单位仍然为兰州大学。

本学位论文研究内容：

☒可以公开

☐不宜公开，已在学位办公室办理保密申请，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请在以上选项内选择其中一项打“√”)

论文作者签名：拜珊珊

导师签名：杨肃昌

日 期：2022.5.31

日 期：2022.5.3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中文摘要

随着 2020 年底我国胜利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地区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2018 年党中央审时度势，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对于发展较落后的乡村地区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大方面分别作出具体发展指示。经过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基层干部的扎实推进，农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正以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镌刻着一幅生机勃勃的“美丽乡村画卷”。同时，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数字经济，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的快速发展，服务于乡村地区的普惠金融也同数字化充分融合，衍生出新业态——数字普惠金融，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以及低成本、高效率等优势，解决了以往乡村地区金融普及的难点，打破了物理边界。为更好的服务于中小微企业以及乡村地区居民，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不断扩展业务范围，为农民生活富裕提供内生动力，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首先，本文利用理论研究法阐述了相关理论基础，并联系乡村振兴五大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影响机理的分析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路径。其次，本文利用 2013-2020 年 31 省（市）的面板数据依据政策性、理论性、科学性等测算了乡村振兴指数，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并利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分别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以及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有，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并在东、中、西部地区具有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的发展呈现不一样的影响效果；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两个中介变量对乡村振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第三，将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进行研究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最后，本文通过联系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发展实际，以本文研究结论为依据，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并对后期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乡村振兴，影响效应

STUDY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China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20,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stands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reat ambi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launches specific instructions in five major aspects, includ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cultural prosperity,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affluent living. With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solid fulfilling of grassroots cadres and the positive response of farmer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engraving a vibrant "beautiful countryside picture" with a vigorous development trend.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big data, inclusive finance serving rural areas has been fully integrated with digitalization, creating a new industry -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medium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latform has been expanding its business scope, providing an endogenous impetus for farmers' prosperity as well a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irstl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 to explai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paper, and confirms the research path of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in relation to the five major development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econdly,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or cities) from 2013 to 2020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policy, theory and science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of this paper. And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released by the Digital Finance Centre of Peking University on 21 April 2021 i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More specifically, we establish the fixed effect model,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nd the threshold models to verify the direct, indirect and non-linear effe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vitalisation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clude: firstl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esent conspicuous heterogeneity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effe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secondl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rural revitalisation by affecting two mediating variables, namel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urbanisation; thirdly, when the level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s employed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it illustrates that there is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Finally, we conclude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oupling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e the outlook for related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ect of impact

目 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4
1.2.1 研究内容.....	4
1.2.2 研究方法.....	5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6
1.3.1 研究思路.....	6
1.3.2 研究框架.....	7
1.4 创新点与难点.....	8
1.4.1 本文的创新点.....	8
1.4.2 本文的难点.....	8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9
2.1 基本概念界定.....	9
2.1.1 数字普惠金融.....	9
2.1.2 乡村振兴.....	10
2.2 文献综述.....	11
2.2.1 数字普惠金融研究综述.....	11
2.2.2 乡村振兴研究综述.....	13
2.2.3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相关性研究综述.....	15
2.2.4 文献评述.....	16
第三章 理论基础及机理路径分析	17

3.1 相关理论基础.....	17
3.1.1 不完全信息理论.....	17
3.1.2 比较优势理论.....	18
3.1.3 长尾理论.....	18
3.1.4 金融排斥理论.....	19
3.2 影响机理分析.....	19
3.2.1 产业发展效应.....	20
3.2.2 生态改善效应.....	20
3.2.3 文明提升效应.....	20
3.2.4 有效治理效应.....	21
3.2.5 增收致富效应.....	21
3.3 影响路径及研究假设.....	22
3.3.1 直接影响分析及假设.....	22
3.3.2 区域异质性分析及假设.....	23
3.3.3 间接影响分析及假设.....	23
3.3.4 非线性影响分析及假设.....	25
第四章 乡村振兴指数的测算	26
4.1 乡村振兴指数指标体系的建立.....	26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26
4.1.2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27
4.1.3 指标体系的建立.....	28
4.2 乡村振兴指数的测算.....	29
4.2.1 原始数据收集.....	29
4.2.2 数据处理.....	29
4.3 乡村振兴指数的分析.....	32
4.3.1 我国乡村振兴水平不断提升.....	32
4.3.2 乡村振兴水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33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35
5.1 研究设计.....	35
5.1.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35
5.1.2 变量选择.....	35
5.2 模型构建.....	37
5.2.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固定效应模型.....	37
5.2.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的中介效应模型.....	37
5.2.3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面板门槛模型.....	38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9
5.3.1 面板数据检验.....	39
5.3.2 基准回归分析.....	39
5.3.3 区域异质性分析.....	41
5.3.4 中介效应分析.....	43
5.3.5 门槛效应分析.....	44
5.4 稳健性检验.....	45
5.4.1 替换模型.....	45
5.4.2 替换变量.....	46
5.4.3 内生性问题.....	47
5.4.4 中介效应的 sobel 检验	48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50
6.1 研究结论.....	50
6.1.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50
6.1.2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50
6.1.3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间接影响.....	50
6.2 政策建议.....	51
6.2.1 优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51
6.2.2 制定农村发展政策要因地制宜.....	51

6.2.3 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52
6.2.4 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52
6.2.5 健全乡村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52
6.3 研究展望.....	53
参考文献.....	54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58
致谢.....	59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21年1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颁布,其中重点指出我国乡村地区要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金融行业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发展动力并充当了“加速器”的角色,扩大其发展渠道,并将优质资源带到乡村地区,不断缩小城乡之间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增加“三农”融资方式。在世界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民生活处处离不开数字生态,然而乡村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特殊主体,要想全面融入数字化大时代,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创业,需要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由于其自身数字化特性,本质上具有一定的普惠性,降低了地域限制、范围限制与门槛限制。只有不断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使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同时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充分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近年来由于我国城市化建设过快,导致乡村地区发展缓慢,人才大多向城市流动,落后的乡村面貌与繁华的城市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党中央立足我国当前的发展现状,从总领全局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的新要求。

从我国现行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看,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端人群、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农民。由于我国国情所致,农民占比较高,所以整体呈现金字塔形状。与之相反的是,我国金融服务结构却大体呈现倒金字塔形状。越是高端人群能够享受到的金融服务就越多,越便捷,但是越地处偏远的农民得到的金融服务就越少,甚至几乎没有。这种不平衡的现状也成为乡村地区发展振兴的阻碍,所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一些突出的问题也实际存在:一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小;二是“最后一公里”问题虽然近几年有所缓解,但仍然存在;三是小微企业融资遇阻,融资成本高,一般农民难以承担;四是乡村居民对金融相关知识的了解不够,意识淡薄。2016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此《规划》的提出对于推动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我国的移动支付已服务于数亿用户,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图1-1中也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同区域均呈稳步上升的趋势。金融科技赋能下的普惠金融要比传统的普惠金

融拥有更加强大的发展力量，提升了传统金融发展的获得性、控制性与延展性。由于近几年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以及 5G 技术从出现到发展成熟，网络逐渐渗透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并且辐射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最近几年兴起的直播文化，让无数隐藏在大山里的“宝藏”被更多人发现，此种传播形式尤其在 2019 年底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发展越来越成熟，具体体现是出现了大量的电商。齐文浩等（2021）指出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电商平台的赋能，此行业贯通了乡村产业链，为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搭建了具有非凡优势的数字化平台，是乡村振兴中难得的发展机遇，要牢牢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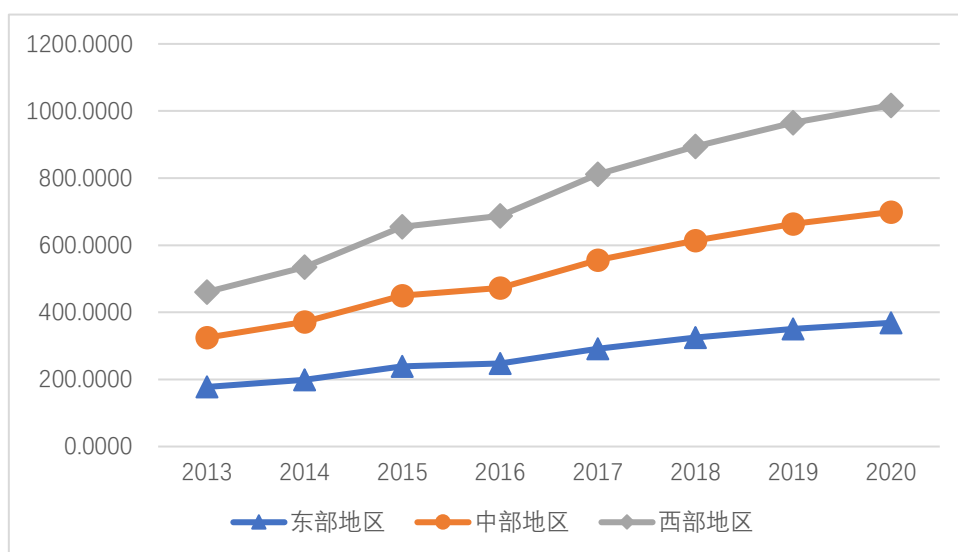


图 1-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图

在充分了解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在我国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后，初步可以得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通过本文的研究，将为如何测算乡村振兴指数提供思路，也将通过不同角度，全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产生的影响，以期能够在相关发展方面提供一些学术性的思考与解释，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下面一一进行具体的阐述。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从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该地区经济与金融的运行提供基础理论依据。从优化农村居民产业结构、加大融资渠道并加强乡村治理等角度丰富我国现有的乡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理论体系。国外有很多数字化加强乡村建设的研究，但由于我国乡村地区的居民利用金融化手段参与经济活动的起步比较晚，因而对宏观经济运行下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从时间发展节点来看，人们对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全新金融业态的认知仍需要一个推进的过程。从目前发展的理论成果来看，传统普惠金融

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和边界尚且不是十分清晰,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普惠金融理解为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所以借助数字化发展,能够有效的清晰研究边界。随着我国数字化、信息化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面临的宏观环境也在积极改变,对现有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对于优化农村数字化发展、优化融资结构等从金融分配的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在现有的理论上积极探索,为精准脱贫之后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更加全面的理论阐述。

第二,由于乡村地区居民的金融消费目前尚不成体系,存在一定的零散消费现象,此研究使得在数字经济着力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的金融消费行为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基于当前的发展背景,数字普惠金融的成功应用以及不断成熟,再加上网络宣传的作用,其运行方式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投融资理念和意识,传统理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挑战。虽然目前尚有一些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关系进行描述和统计的文献,但现有此方面的理论大多较为分散,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不在同一水平上,因而尚未形成一个成熟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由此通过本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对内在理论逻辑进行梳理,进一步丰富农村地区居民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形式进行投融资进而加强经济发展,并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一点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

(2) 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作用于乡村振兴来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站在我国在 2020 年底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的伟大起点上,如何通过各方努力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扎实有效的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首要问题。近年来“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大为流行,融合发展出的数字普惠金融也逐渐成熟,可以在融资层面起到更大的作用,通过大数据手段及时、快速地调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资本,缓解传统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排斥、成本过高等问题。本文在如今数字经济大力发展的基础上,结合适应农村偏远地区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形式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较为客观的得出能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对策。

第二,为宏观经济运行中乡村地区如何进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参考。乡村地区无论是从生活配套设施,还是生产配套设施,都受制于地域、地形和基础设施的限制,无法享受到和城镇一样的金融服务、消费形式,但是因为互联网的无边界互联以及信息资源共享的特殊技术形式,较低的运行成本以及较弱的金融排斥(葛和平和钱宇, 2021),它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并且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提出一些具有参考性的建议。

第三,对于提升乡村居民投融资水平,提高产业发展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传统普惠金融由于其发展模式的限制,存在实施难度大的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个问题,数字化传播形式广泛,宣传力度大,不仅能扩大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也能扩大农民的融资渠道,通过电商直播、新型数字保险、网银理财等形式极大的提高了农村居民对资产管理以及创业形式的认识。网上信息获取便捷、形式多样,可供农村居民选择的种类也较为丰富,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以及运行情况选择适合的投融资方式,进一步壮大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果。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自“普惠金融”这个概念被提出以来,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内涵在不断扩大,直至数字化发展越来越成熟之后,金融科技的概念被不断的提及,与之结合的数字普惠金融逐渐被运用到金融市场中,成为服务乡村地区金融发展的利器。普惠金融的核心思想在于“普”和“惠”上,怎样将金融服务深入到偏远山区,做到最大范围的普及,同时打破金融排斥,将优质的金融资源分配到偏远山区的乡村居民手中是数字普惠金融应该发挥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视角主要在于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是怎样的,以及影响作用中是否还有外界变量的影响。在进行具体影响的研究前要通过统计学方法将所需要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数据测算出来,并在充分分析出本文的影响效应之后,针对性的提出一些相应建议。以下是本文的章节安排:

第一章主要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两个方面梳理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简单概括研究内容和在文章撰写过程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并简述研究思路。最后从问题、视角、层次三个角度总结本文的创新点。

第二章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分别进行概念阐述。接着将撰写本文之前阅读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数字普惠金融研究综述、乡村振兴研究综述以及二者的相关性研究综述三个方面整理了文献综述。

第三章分为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理论基础的阐述,包括不完全信息理论、比较优势理论、长尾理论、金融排斥理论;第二,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五大方面的影响分别做机理阐述;第三,结合影响机理总结本文的影响路径并提出相应假设,分别为直接作用分析及假设、区域异质性分析及假设、间接作用分析及假设、非线性溢出效应分析及假设。

第四章为乡村振兴指数的测算。首先在政策性、理论性、科学性、完整性以及数据可得性基础上建立乡村振兴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模糊评价

法和熵权法测算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其次对测算出来的乡村振兴指数做简要的分析。

第五章主要是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并将数据带入模型中进行计量分析。同时，将以上得出的结果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来充分验证结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第六章主要是对前文的理论以及实证结果进行总体分析梳理从而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站在前文背景分析、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发展建议，同时对后期相关研究做出展望。

1.2.2 研究方法

（1）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在进行本文的影响路径研究以及分析其内在机理时，首先应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然后根据实际分析其中的作用机理，最后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来验证机理分析的正确性。本文在数据的选择上选取了面板数据，原因在于使用面板数据能够扩充样本量，以提高本文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科学性与合理性。

（2）归纳分析与演绎分析相结合

本文通过前期阅读大量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已有国内外文献，对其中的重要观点、结论进行总结，并运用科学的归纳方法，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理论以及实践方面的发展脉络引导。此外，在分析传统普惠金融过渡到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则使用了演绎分析法。

（3）微观机理与宏观影响相结合

乡村地区经济的稳定运行，离不开宏观层面的充分协调，也同样离不开微观个体自身能够拥有不断发展的意识。目前乡村居民的金融行为还都满足于自身生活需要，通过简单的投融资行为来使当前的经济附加值达到最大。农村居民家庭资产分配和普惠金融结合的形式对当前经济形势、农村居民发展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而对宏观经济的政策制定也会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地区发展的契合度，最终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总之，乡村地区如何更好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既是微观层面的个体分析问题，又是宏观层面的整体把握问题，所以只有把二者相结合，不断深入了解，才能对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从全局上进行深度剖析。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1.3.1 研究思路

由于大数据及数字化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数字经济也逐步渗透民众生活,微信、支付宝的出现也进一步将数字金融推到了重要的位置。普惠金融的创立出发点就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传统金融无法渗透到的地区和居民,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能够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务力度。乡村如何振兴,还得依赖于经济水平的提升,村民有了多余的金融资产,能够通过更多渠道获得创业、就业的资金,有了赖以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手段,再加上精神文明层面的不断建设,乡村振兴就可顺利完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包含面较广,本文通过不同方面的分析,验证其直接作用效果是否强烈,有哪些制约因素会阻碍其发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是否能够起到有利的正向作用,作用力度多大也是本文的探究内容。此外,互联网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乡村地区的发展中呈现出了何种影响效果,是否受到“数字鸿沟”的制约?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¹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3-2020 年 31 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在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下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首先通过政策性、理论性、数据可得性以及科学性、完整性等原则上综合考量,并从全面提升乡村振兴的五大方面出发,按照这五个方面对于乡村振兴的影响程度不同设置具有差别权重标准的衡量指标,并参考熊正贤(2020)、张焱(2021)、毛锦凰(2021)、吕承超和崔悦(2021)等的做法,通过模糊评价法和熵权法的充分结合构建乡村振兴指数。其次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数字化发展程度更是存在较大的悬殊,所以本文还将进行不同维度的区域异质化分析。再次本文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分别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间接影响。此外,由于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一致导致了部分偏远地区的数字化程度不够高,很多方面的数字金融服务未能及时享受,同时还导致了“数字鸿沟”的出现,进一步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乡村振兴的发展,本文通过构建门槛模型检验其产生的影响。最后,通过综合以上结果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下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发展的建议。

¹ 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 年第 19 卷第 4 期,第 1401-1418 页。

1.3.2 研究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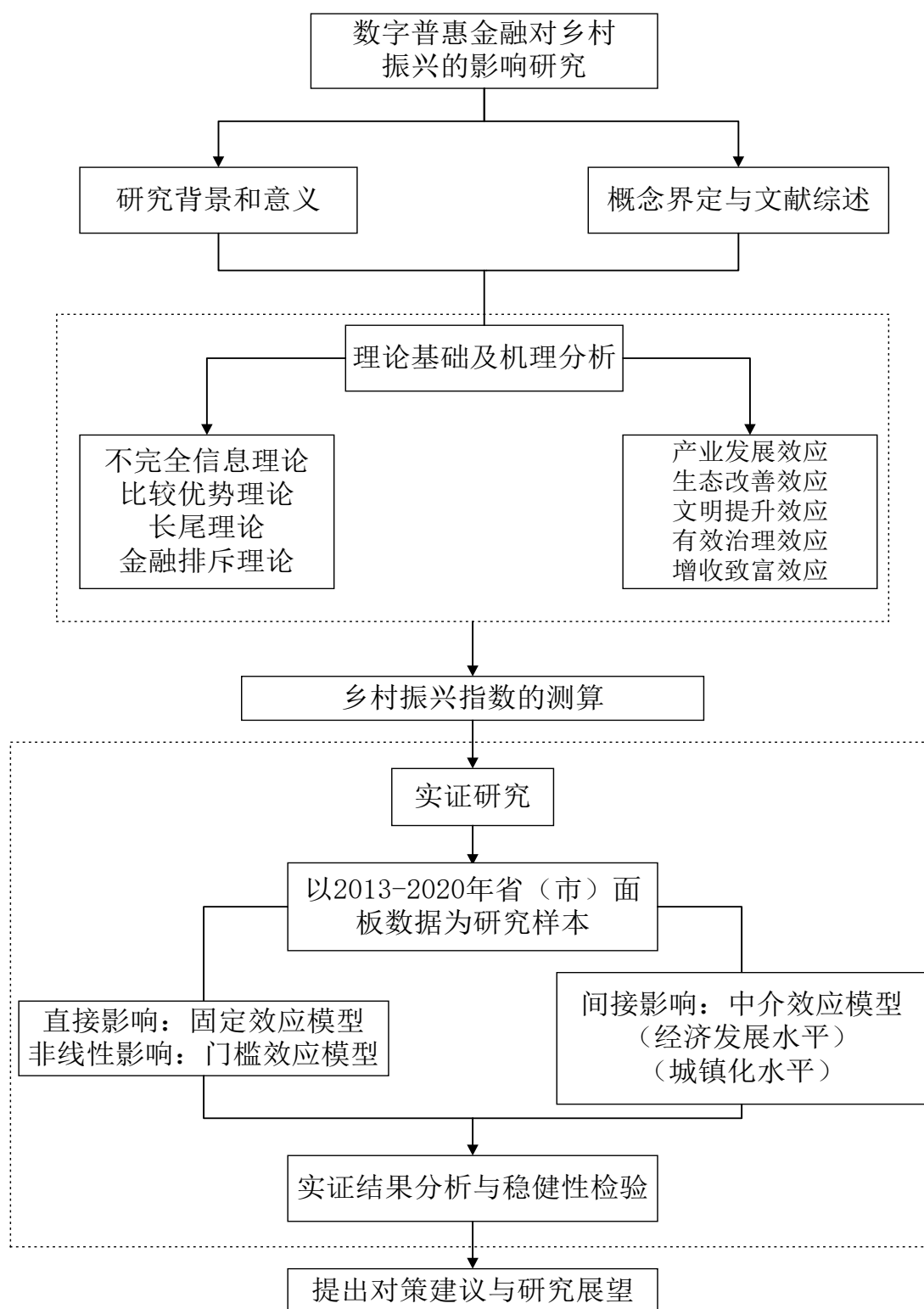


图 1-2 研究框架图

1.4 创新点与难点

1.4.1 本文的创新点

第一，研究问题上的深入。本文深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地区的实施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尝试构建了二者相关性影响的研究框架。所以本文将影响作用分为线性影响和非线性影响，其中线性影响又分为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通过理论机理以及实证检验两部分，将本文的影响研究框架尽量做到全面、具体，同时结合了当前农村发展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变量进行深入分析。

第二，研究视角上的与时俱进。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将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视角多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贺健和张红梅，2021）、城乡收入差距（周利和冯大威，2020）、农村传统金融机构（张岳和彭世广，2021）等，乡村振兴作为精准扶贫之后乡村工作的核心，以其作为研究对象较为贴合如今的发展现状，目前此方面的研究文献还不多，可以通过分析得出较有意义的结论。

1.4.2 本文的难点

撰写本文存在的难点主要有：

第一，由于本人的学术水平有限，在进行研究论证的时候，难免会有疏漏，考虑的不恰当的方面。同时，由于本文在测算乡村振兴指数以及做本文的实证分析时，所用到的数据较多，时间跨度较多，有些数据在测度上面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在数据可得性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完全的问题。

第二，在进行乡村振兴指数测算的时候，建立的指标体系并没有完整统一的政策或者学术上面的正式成文规定，不同的建立角度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最早的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发端于国外，后来传入我国，服务于我国的实体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试验，并伴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功为乡村地区发展经济提供内生动力。本章节先从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学术性基础，并为本文的撰写提供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的前身就是普惠金融，是其空间上的功能延伸，是数字化时代“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的产物。首先来阐述普惠金融的相关概述，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一些非政府组织通过一种非正式的公益形式向一些困难家庭居民发放小额贷款，这是普惠金融的雏形。普惠金融指的是以可承担的成本为那些有需要的社会阶层和困难群体提供行之有效的金融服务，特别是那些地处偏远的，传统金融服务无法照顾到的区域。其中，农民和低收入人群是普惠金融的目标帮扶对象。其终极目标是消除贫困和资源获取不平等性，并且可以扶持小微企业和困难家庭经济增长，扩大金融服务版图，并不断提升服务效能，让所有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到日常必需的金融服务，这一点和我国现行的大政方针不谋而合，息息相关。普惠金融既可以从经济学方面理解，也可以从社会学方面理解。作为经济学理念，它扩充了金融体系的容量，将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传统金融服务无法提供到的地方。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普惠金融可以服务于那些被经济发展所忽视的群体，特别是无法便捷的获得金融服务的低收入人群，尽量提高社会的公平性。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与实践，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实现乡村居民平等发展、消除贫困、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同时它也成为衡量一国金融体系是否公平的道德标准。

近年来，互联网逐渐深入到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技术的大力推广，使得数字普惠金融这个概念逐渐进入大众视角并得到了不断发展。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是指通过数字化手段，包括计算机及通信、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处理平台、云计算等的驱动下，普惠金融得以实现的统称。数字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极大的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便利了服务机构的同时也便利了群众的使用，

很多难以实现的金融服务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整体上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总的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是站在新的起点为其不断更新发展提供长足动力,促进金融服务可以更好的被普惠到传统金融行业排斥的人群当中。将其作为乡村金融发展支点的意义如下:第一,金融服务所需成本不断降低,金融运行的可负担性不断提高。以往需要通过物理手段搭建的平台都通过互联网轻松实现,不仅提高了运行效率,也提高了时间效率;第二,企业的可持续性被不断加强。金融行业的成本降低也是变相的扩大了利润空间,使得金融行业加强了其可持续性;第三,金融的可获得性不断提高。数字化方式代替了以往实体网点的一系列运营,打破了服务边界与限制,使得更多的金融服务能走进千家万户,特别是偏远地区;第四,金融服务的全面性不断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及大数据平台的,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金融服务更加贴近民生,更加大众化,切实完善群众真正的金融需求。如今,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全球农村金融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国作为传统的发展中大国,站在顺利完成精准脱贫的胜利节点上,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问题。

2.1.2 乡村振兴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完成,我国已经在全社会层面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广大农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新时代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历史任务。走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征程上,经过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乡村有了新的面貌,乡村发展的环境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有了新的变化,村民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新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对于以往乡村工作总结基础上的升华和完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它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一是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部署农村现代化任务;二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调整城乡协同发展路径;三是对农民土地承包的期限进行新的明确;四是制定新的乡村治理秩序;五是重新规划农村人才队伍发展的方向。同时,根据现代农村发展新格局,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

当前我国“三农”工作总体呈现稳步推进、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依托于国家大规模扶持以及政策倾斜,现代农业呈现总体向好的发展态势;二是农民收入在各类经济手段的促进下稳步提升;三是由于不平衡与不完全的现象突出,农村繁荣发展态势依然不容乐观。长久以来我国十分重视乡村的建设,“乡村美,农民富”是党和国家的期盼。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不乏有很多老问题存在,一是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主要是由于前几年城市

发展速度较快,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同时更为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吸引着不少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但是由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往给人落后贫穷的山村风貌已经改变,近几年也有不少人才回流的趋势,城镇化脚步进一步减缓。二是农业边缘化问题突出,主要是由于前几年我国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通常把二三产业量占 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如此一来使得农业地位下降,不少农业产业的发展也遭遇瓶颈期,更加需要考虑到的是,由于农产品的属性问题,它一般属于生活必需品,价格弹性小,难以拥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市场竞争力偏低,难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得到有利地位,并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较窄,难以及时应对市场的变化以做出应有的调整,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失。三是乡村地区普遍老龄化问题突出,主要原因有农业收入不高,不少年轻人会更加愿意到相对发达的城市谋生,接受更为广阔的视野。不少老年人思想保守,传统观念较重,不愿跟随子女到城市生活,造成农民群体越来越偏老年化。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完成和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此类现象有所缓解,“新型农民”、“智慧农民”的出现会使农业有进一步的发展。四是乡村地区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现有的融资体系过于单一,无法做到物尽其用。由于自 2020 年来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普遍降低,金融市场疲软,再加之我国乡村地区的发展一直以来受到投资不足、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困扰,对于如何充分完善乡村发展的融资体系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五是乡村振兴在发展过程中尚未真正确立有效的、可执行的制度,所以无法拥有一个确切的行动指南。大多数问题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还未有行之有效的学术理论作为支撑,无法真正解释其存在的发展内涵。

2.2 文献综述

2.2.1 数字普惠金融研究综述

国内外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一系列研究,有较多的文献指向不同的研究对象,基于文献梳理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改善农村的贫困状况。数字普惠金融主要依托于数字化发展,如今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物联网、供应链等技术支撑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产生以及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创造力,创建一个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葛延青(2020)从不同角度综合分析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路径。齐文浩等(202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乡村地区居民的收入,扩大增收来源且主要是通过电商平台、互联网以及普惠金融等方式实现,同时还研究得出创业活跃度对于

增收效应的调节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赵涛等（2020）也进一步通过实证验证了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高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激发大众创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红利。数字经济的大力发展能够拓宽民众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王林辉等（2020）通过分类测算岗位更迭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发现大数据 AI 技术在资本密集型地区的收入分配效应尤其明显。由此看得出来资本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合理分配。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利用 CFPS 的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验证了数字金融的大力发展对当前农村地区金融需求所存在的异质性影响，得出数字金融的持续性发展会降低农村生产性正规贷款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又会增加对消费性正规贷款的需求。这一结论对提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有很大的参考性意义。同时，易行健和周利（2018）也利用 CFPS 数据得出了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加大居民消费水平的结论，但是也说明这种促进作用仅仅显著于中低债务家庭。Aditi Kapoor（2014）通过研究印度农村经济与数字化金融的关系，认为普惠金融可以作为乡村地区发展经济的稳定器，它的存在能够有空间使得所有群众都参与到经济发展当中来，而且自身也可获得部分收益，同时由于电子信息化的发展，能够增加印度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目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情况来看，其在乡村地区的大力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当地新型就业形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一波自主创业的小高潮。也有学者指出，数字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补充，提高了金融业的包容性。周广肃和樊纲（2018）通过与没有接触过互联网的家庭相比，利用互联网进行发展的家庭在自主创业上会提高大约 3 个百分点，并且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杨伟明等（2022）选取中介效应分析经济增长和创业行为二者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是可以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两个变量的作用中不断发展来实现的。张青等（2021）通过使用调节变量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显著的促进了农村非农青年的就业，并且验证了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以及社会信任的要素对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发展效率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地区间的差异，张岳和彭世广（2021）通过分析全国村镇银行的利润总额而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应用和村镇银行所获得的盈利之间呈现出一种倒 U 型关系，且在东部地区呈现出促进作用更强的结论。

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剧了农村贫困状况。何宗樾等（2020）通过工具变量估计，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贫困的发生概率，影响机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导致了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居民失业率的增加。Qian 等（2020）通过分析数字金融与银行业的金融效率得出，数字金融略微提高了我国金融业的效率，但在省级效率的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虽然金融部门效率与数字金融效率正相关，但数字金融给落后地区带来了劣势。张岳和彭世广

(2021) 同样也认为, 数字普惠金融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会在一定阶段上对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在于人们的投融资意识不强, 以及村级地区的数字化设施较为缺乏。Darja Reuschke 和 Colin Mason (2020) 探讨了家庭式小企业利用数字化参与行业竞争的情况, 结果表明家庭商业领域中以数字化形式进行运营的部分比例很小, 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家户型小企业目前还较少利用线上形式发展, 所以他们认为存在家户型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联合线上平台和智能市场的作用被放大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乡村地区更为突出。孟娜娜和栗勤 (2020) 则从产业竞争方面着手, 得出当前金融科技不断普及对传统普惠金融提出了挑战, 产生了“挤出效应”, 二者结合产生的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银行业竞争水平。钟凯等 (2022) 通过机制检验, 发现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信用中的二次配置, 所以可以增加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 减少中间供给。此外, 由于大多数农村地区地处偏远山区, 网络搭载技术实施难度大, 信号传输困难, 所以学界对于此研究也提出了“数字鸿沟”的概念, 星焱 (2021) 通过归纳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模式, 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 提升农村的经济发展, 如此就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源禀赋的提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实情况与实际所需不符时, “数字鸿沟”现象就会显现出来, 潜在金融风险就会发生。Beck 和 Brown (2011) 也同样认为乡村地区由于留守老人较多, 适应数字化生活需要更多的时间, 当迈过一个门槛之后, 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 低收入人群在接受金融产品上难度更大, 这会成为阻碍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很大因素 (Malady, 2016)。

此外, 在研究方法上, 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做法。黄金增等 (2021) 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的研究方法, 分别探讨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几大因素, 最后得出影响经济发展需要多种联合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论。贺健和张红梅 (2020) 利用 2013-2018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通过熵权 TOPSIS 方法测算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并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以及门槛模型分别检验。在如何衡量数字乡村的建设上, 崔凯和冯献 (2021) 也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政策文件及理论实践,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构建了乡村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 为完善数字乡村评价体系做出新的贡献。傅利福等 (2021) 通过 Bonferroni 曲线测度了社会包容度, 并以此为研究对象, 验证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其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2.2.2 乡村振兴研究综述

由于乡村振兴的概念提出时间尚短, 国内相关研究文献集中在最近几年, 研究指向大多数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为主。国外乡村地区转型发展乡村贫困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经常出现。本文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梳理主要以以下两个方面为主:

一是乡村振兴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Ragnar (1952) 的“关于贫困的恶性循环”、Lewis (1954) 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Kuznets (1955) 的“增长、不平等与贫困”、Myrdal (1957) 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以及 Rodan (1961) 的“大推进理论”等, 随着理论不断发展,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系统阐述对于贫困的相关概念界定以及测度方法问题, 这为后来此类研究的相关理论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志平和吴凡夫 (2021) 运用中介变量的方法探究了农村电商、乡村振兴与减贫的关系, 得出农村电商通过乡村振兴对减贫起到了间接作用的结果。Katsushi S.Imai 和 Jing You (2014) 通过分析指出通过进城务工以及在乡村继续从事农业产业的工作方式可以实现持续性脱贫; 但是 Christiane 等 (2014) 指出, 乡村地区如果可以出现返乡潮, 回归的人们可以将在外吸收的知识、才能等核心优势竞争力带回, 从根本上带动乡村地区进行不断发展。陈兢 (2021) 通过分析广西 111 个县级地区的数据, 得出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有效推动了产业集聚, 并且此种现象在越贫困的地方会越明显。同时,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 导致乡村地区的发展受到影响, 朱纪广和侯智星 (2022) 通过对动态劳动力分析得出城镇化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促进的结论。

二是乡村振兴如何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许多学者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落在了如何提高农民创业上, 认为只有拥有可以持续发展的收入渠道, 才能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进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发展。石丹淅和王轶 (2021) 通过对湖北、重庆、湖南、贵州四省 (市) 的农民返乡创业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影响农民工创业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影响最深的有创业者的受教育年限、务工经验以及互联网+水平。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模糊对于地域的划分, 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我国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双创”战略使得农村也成为广大有志向的群众发展的地方, 姜姝 (2021) 以“城归”群体的“乡情”来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对乡村地区经济的提升作用以及它对于乡村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熊正德等 (2021) 则认为金融资源配置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行变量, 普惠金融在乡村地区的不断发展能够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强大的推动力, 尤其普惠金融的广度能够对发展农村经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建波和孙子淳 (2021) 也同样认为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是乡村振兴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供给严重不足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杨儒凯 (2021) 通过分析中央对乡村振兴的文件要求, 指出金融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并强调了所遇到的关于担保机制过旧、创新机制难以适应现如今的社会等问题。所以要实现乡村地区经济稳步增长, 还是要从根本上创造一个优良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何广文 (2021) 也提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需要创新打造特色产业与金融产品相结合。

2.2.3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相关性研究综述

金融原本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传导器,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数字金融的不断发展打破了乡村地区的金融屏障,张勋等(201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家庭收入,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地方发展速度更快,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这一结论对如何提升乡村振兴提供了现实的参考意义。长久以来,农村地区由于知识水平匮乏,限制了发展速度,郭峰和王瑶佩(2020)指出,农户对数字金融的应用与他们对传统金融的认知有关,具备一定相关知识教育的人,更容易接受其使用。所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是刻不容缓的发展手段。谢地和苏博(2021)通过构建乡村振兴指数,从实证的角度得出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正向带动乡村振兴的结论,同时还验证出数字基础建设水平和传统金融发展的水平均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季刚和马俊(2021)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并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单一门槛特征。何广文和刘甜(2018)也曾指出乡村要实现振兴必须要有农村金融科技创新的驱动,应该更多的运用互联网手段,降低交易成本,打造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并且郭国峰和张颖颖(2021)论述了在普惠金融作用下乡村地区各项发展的相关内在机理和实证检验后得出,普惠金融可以带动农村经济长期正向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至关重要。再加上农村地区居民的脆弱性,一般难以抵御金融风险的存在,彭澎和徐志刚(2021)通过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其投融资功能来增强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陈慧卿等(202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作用,并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而减小,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加强的结论。由于数字普惠金融自身拥有一定的发展动力,马亚明和周璐(2022)从双创的角度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创业对乡村振兴产生的正向影响,并可以不断调整农村人力结构。外在动力可以通过政策等的扶持来支撑,而内在动力需要开拓更多发展路径,何铁林(202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电商发展不仅能够带动乡村产业升级,并且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打破现有的金融排斥壁垒。田霖等(2021)利用系统 GMM 模型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不断在乡村地区的发展会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推动作用。

然而这两者在互相促进的过程中不乏会有一些问题显现,邢鸿飞和吕汉东(2021)通过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进行考察,发现在监管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然而探究普惠金融本身的属性,它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媒介,谢琳(2020)认为通过普惠金融的介入,可以进一步优化配置各种金融资源,此举有助于解决贫困地区低收入群体和部分中小微企业一直以来被困扰的融资约束难题。星焱(2021)对于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结合乡村振兴的具体要

求,与其他科技、教育、金融等体系协同发展才能打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鸿沟”。王胜等(2021)也同样认为,乡村数字化建设尤为重要,他们通过运用数字经济作用的载体和推动力,分析得出分类建设数字乡村的实现路径,进而得出由此可以很大程度上推动乡村振兴的结论。基于以上学者观点,可以得出创新金融产品很重要,并且要设计一些“因地制宜”的金融产品来促进当地经济进一步提升,邹新阳和温涛(2021)通过31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分析提出要在创新普惠金融产品上进行着手,来降低乡村地区金融产品的不匹配问题,提高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的资金使用效率,从而引导优质资产以及小微企业贷款流向乡村地区,提升乡村振兴水平。冯兴元和孙同全(2019)同样也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更新金融产品并积极提出创新理念,同时他们还提出为了满足乡村振兴过程中对金融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地方的金融机构要充分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发展。

2.2.4 文献评述

乡村振兴自提出以来时间较短,处于与脱贫攻坚相衔接的开始规划发展阶段,目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相关性的研究文献较少,根据现有文献研究来看,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普惠金融的提出就是着眼于传统金融无法服务到的地方,重点突出其“普”和“惠”,即“普及”和“优惠”。乡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金融生态环境的劣势,无法享受到很多优质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出现刚好弥补这个短板,而数字普惠金融更是以其低成本、大范围的属性,能够将普惠金融的作用更大限度的发挥出来。农村居民可以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获取,进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从而可以使得农民拥有长久发展并赖以生存的方式。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正向影响受到“数字鸿沟”的阻碍。乡村振兴的提出背景包括农村地区近几年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严重、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等,此类问题造成了乡村地区“数字鸿沟”的出现,虽然数字普惠金融在理论上可以带动经济及产业发展,但是对于数字化使用难度大的人群来说,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所以,在现有文献中,很多学者在结论中也均提出要大力提升乡村教育水平、加强互联网基础建设的观点。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地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所以应该在产品设计上更多的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兼具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简单的将二者之间的关系概括为线性关系并不十分严谨。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应当从多角度激发内生潜力,为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第三章 理论基础及机理路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涉及多个理论,本章节通过联系其在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相关的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此外,本章节从乡村振兴的五大方面着手,一一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作用机理,以使本文的理论基础更加完善和严谨,也能从理论的角度来佐证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并结合发展路径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3.1 相关理论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的本质概念都与乡村地区各项发展息息相关,涉及以上二者单独的理论基础较多,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二者的相关理论,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以乡村地区的发展特征为背景,从二者的交叉理论中选取了以下四种理论做分别的阐述,为本文研究的学术性奠定基础。

3.1.1 不完全信息理论

所谓不完全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指的是市场中的各经济参与主体在现行的经济状态下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不能拥有的所有有效信息。反过来说,不完全信息也同样会导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出现。该理论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不仅包含了传统交易市场,还扩展到了现代金融市场,尤其乡村地区信息化发展程度极度不发达,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情况较为普遍,并逐渐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理论之一。在传统的农村信贷市场上,商业银行和农户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大多数情况下,农户由于缺乏必要的金融相关知识,不能准确的提供应有的贷款所需资料。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经营情况、收入情况、偿债能力、投资风险等有较为清楚的了解,由此加剧了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一定程度上损害银行的利益。不完全信息在农村信贷市场上低效的表现是逆向选择,由此加剧了贷款需求和贷款供给间的矛盾。农业贷款的长周期、高风险等的隐患,再加上商业银行放贷的一系列农业贷款利润较小,导致商业银行资产风险进一步加大,并伴随着一定的道德风险。由于不完全信息存在,会对乡村地区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带来一定的困难,可以在后期发展中注意相关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匹配信息,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行难度,使其更好作用于乡村振兴。

3.1.2 比较优势理论

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出,效率(Efficiency)指的是社会可以从稀缺资源中所能得到的最大收益¹。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指的是为了获得某种东西而放弃另一种东西所要付出的最大成本²。理性人将所拥有的资源经过优化配置和规范合理使用,在当前的物产环境下最大可能性的实现其潜在目标。此外,人们通常会权衡一个物品给其带来的收益与所要付出的成本,相同产出下在该物品上的投入量较少的被称为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付出机会成本较低的被称为有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在如今国际电子信息化产业发展迅速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有限,但是分配机会却相对均等,对于后现代化社会的某些物品来说,很少有绝对优势一说,或者说此类现象在逐步减少。与此相反的是,生产同类产品的机会成本较低的群体却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当前的传统产业以及国民支柱产业当中。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要不断的引进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手段,例如高科技自动化农业机械设备、电子销售平台、农业宣传网络等,这些相比于传统农业机械和宣传来说,既节省了物料成本又加大了产出。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电子化、数字化、专业化水平,以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践证明,乡村地区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比较优势较低,需要在后期的发展中发掘相关的优势产业,开辟新的发展路径,同时也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手段的不断更新,增强其发展优势。

3.1.3 长尾理论

长尾一词最早来源于数学基础知识,是指产品的需求曲线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欠流行的产品销量相比于头部产品销量少得多,但不会降到零。这种通过统计软件而形成的需求曲线通常相对于头部而言其尾部较长,所以在经济学与统计学中将这种形状的曲线称为“长尾分布曲线”,即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 Effect)来源于此。在市场竞争中为了提高盈利,企业可以针对性的对此现象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拿经济吸引力来说,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殊性导致这些利基产品和头部产品是一样的。正态分布曲线中,大多数数据都会集中在中间部分,即这里所说的“头部”,也通常利用这部分数据进行各种现象的解释,而处于“尾部”的数据就会被当作极端值进行处理,不做过多的分析,因为这部分数据的占比不多,需要人们投入更多的精力才会被关注到,所以经常被忽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要反映为少数掌握主体信息的人一般会在社会中造成深远的影响。经济市场中

¹ N·格里高利·曼昆. 经济学原理[M]. 德赖登(Dryden)出版社, 1998.

² 德里希·冯·维塞尔.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M]. 1914.

信息交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数字经济的发展逐渐开始打破少数人拥有信息优势的局面,处于发展长尾的乡村地区居民可以通过网络优势获得部分信息,也表现为在电商平台迅速占领市场的今天,一些低收入人群通过长尾效应,可以占领一部分市场资源,来获得经济收入的增加,同时也可以借助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融资困难,融入市场。

3.1.4 金融排斥理论

普惠金融产生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够打破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现象,这个概念的出现是由于在当前数字化业务普遍上线以来,实体金融机构为了更大程度上节约办公成本,撤销了部分偏远地区的营业网点,由此导致这部分区域的居民无法正常接受金融服务的现象。¹金融排斥从广义上可分为自愿排斥和非自愿排斥。其中,非自愿排斥也被称为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金融排斥,是指人们对基础金融服务存在客观需要,但因受制于一些因素而未能正常获得的现象。然而在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到的金融排斥,大多都是非自愿排斥,由于一些地区深处大山,受地理环境、经济环境等的影响,满足群众日常需要的金融服务无法正常获得。互联网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个世界,它的出现让普惠金融成为可能,而国家相关部门也不断提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发挥其最大作用从而为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提升“造血”功能。

分析了以上的相关理论之后,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例如,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乡村地区无法获得发展中所必需的市场信息,使得市场发展不完整;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乡村地区的产品竞争力较小,人们更加愿意挑选能够带来更大效用的产品;由于长尾理论的存在,乡村地区的发展经常被忽略,从而很少能够抓住发展机遇;最后,由于金融排斥现象在乡村地区比较严重,使得一些必要的金融服务难以在乡村地区正常开展。在总结了以上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之后,本文联系乡村振兴的五大方面将理论联系实际,进行了如下的影响机理分析。

3.2 影响机理分析

普惠金融的提出是对偏远地区以及中低收入人群的一次金融功能实现机遇,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将这个优势放大,也是对普惠金融新的延伸和扩展。它的发展在高科技产业不断成熟的影响下,其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依托于

¹ 黄达,张杰.金融学(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7:290-291.

互联网和数字信息化平台的平稳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依托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供应链的快速发展阶段。数字普惠金融的成功运用,改善了乡村发展过程中物理距离过远,运输成本过大等难以解决的桎梏,使得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有了腾飞的翅膀以及前进的动力。下面分别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乡村振兴五大方面的各自影响机理。

3.2.1 产业发展效应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新时代我国农业发展是重中之重的问题,本着以实现产业化发展的目标,我国进行了农业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观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中产业发展模式,产业间未能做到充分的融合,也没有相对合理的配置比例,农业发展缺少比较优势,效益较其他产业低,市场竞争力弱。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打破了乡村地区的融资壁垒,为现代农业不断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前进动力。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路径主要是通过融通资金链来支持产业结构向规模化迈进。通过数字信息化手段积极开发并创新金融产品去适应目前农业产业的调整发展,解决融资需要。同时,依托数字化的优势,建立大数据征信系统,推动乡村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并充分与当地龙头企业合作,充分发挥对农业产业的扶贫作用,同时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信息,因地制宜的研发个性化的“三农”金融产品,加大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着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

3.2.2 生态改善效应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发展要求。多数乡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等的影响,生态环境较为原始,未经开发和治理,难以达到宜居美观的要求。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与当地的绿色产业项目合作,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联合开发当地的绿色资源,使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大大改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将一些宝贵的、可以利用的生态资源利用起来,通过乡村旅游、医药基地等方式二次组合,不仅可以提供发展方向,而且可以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借助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贯彻绿色金融发展理念,通过政府的协助与引导,把握好生态文明项目的方向,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提升绿色生态农业贷款获得率,从而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并着力提高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便农村居民的出行,真正意义上实现“看得见”的乡村振兴。

3.2.3 文明提升效应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长效内核。信用是金融的核心,也是金融产品的标志,

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机构应该积极建立有关平台,并通过更为适应当地群众的方式进行金融知识的宣传,提高乡村居民的信用意识,并制定回访制度,确保乡村居民可以随时掌握授信信息。同时,利用村部集体活动中心等,将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理念普及到广大农户中去,充分引导农户形成诚信守约意识。此外,通过金融知识的再教育,形成全民懂理财,晓金融的良好金融环境,也给需要融资的个人和企业带去正确的融资渠道,良好的金融意识,不断打造一个信守合约的文明新乡村。这样不仅有利于打破信息不完全的局面,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乡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使得乡村地区也能够拥有和城市一样的发展渠道。

3.2.4 有效治理效应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发展需要。乡村治理所包含的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同时还要兼顾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参考陈熹和张立刚(2021)的研究,普惠金融不仅能够调整农村地区的经济结构,也能够优化农村地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金融体系的担保制度也能够反映出信用问题。依托于大数据信息化下的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最大程度的覆盖乡村地区的征信系统,创建起较为全面的涵盖个人基本信息、信用卡消费、借贷信息等在内的立体化征信信息数据库,数据平台资源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共享,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融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推动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改善金融排斥现象,不断地从本质上提高治理效能,并能够加强乡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将乡村治理的软实力变为社会融资的硬实力,切实为乡村地区的纵向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真正实现治理有效的乡村新面貌。

3.2.5 增收致富效应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随着国家脱贫任务顺利完成,乡村地区的整体面貌较之以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农民对于生活标准的追求也有了更加多元的目标,不单单只是停留在收入增加上,还包括医疗、交通、教育、治安等公共物品不断保障而带来的间接益处,同时随着农业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家政策鼓励人才返乡等多举措并行的条件下,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满足感和幸福感较之以往有了质的飞跃。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帮助乡村发展跨越以往单一金融服务的城乡金融鸿沟,拓宽金融服务的维度,并依托网上银行、远程银行等提供更为全面的金融服务。同时,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各地区的不同特征,因地因势的通过普惠金融的特点向农民定制金融服务,并且通过合作服务、担保承租、股权分置、众筹等金融工具创新,使得民间资本更好的优化配置,

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生产生活各方面全方位的保障水平，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3.3 影响路径及研究假设

3.3.1 直接影响分析及假设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普及，数字普惠金融为乡村地区的发展着力打造了很多针对性的发展路径。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产业发展一直被放在首要推进的地位，所以在此过程中要积极联合有关金融机构发挥协同作用，通过农牧产品特色保险、农牧产业特殊贷款、农产品期货等金融服务全方位保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融资功能，可以大力开展生态环保产业的联合发展，致力于打造绿色生态农业、绿色产业、绿色环保项目等，从源头上改善乡村地区生态保护力度不够、生态环境不够宜居的现状。数字普惠金融所具备的融资、宣传、资源配置等功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还能在提升乡风文明程度、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方面有所作用，但是作用效果没有发展产业和生态环境那么强。总的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可以发挥直接作用，金融作为国民经济中最核心的手段，它的优势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挥出最重要的作用，提升农民整体生活的富裕程度。此外，由于金融科技的大力发展，可以创新出一系列适应乡村发展的金融产品，为乡村振兴的稳步发展提供动力。根据二者间的影响机理，总结其影响路径如图 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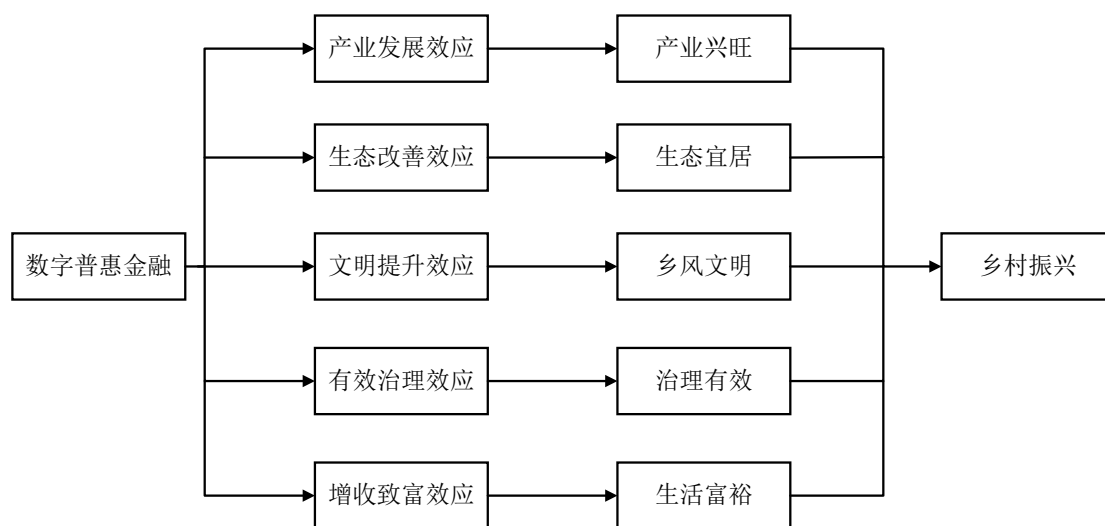


图 3-1 直接影响路径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本文 3.2 中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假设 1 如下：

H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3.3.2 区域异质性分析及假设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某些领域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大体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格局。地理位置的不同、外贸的开放程度、生活环境的不同等都是导致发展差异较大的原因。与之相对应的是,城镇化发展也与经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例如,2018年的统计中,深圳的城镇化率为100%,达到完全城市化,部分一线城市的城镇化率均已超过70%。然而,西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的城镇化率还是很低,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影响,乡村发展困难较大。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方面,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也有很大差别,由于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数字化发展快速,能够运用在乡村地区发展中的数字化手段也更丰富,但是由于乡村概念较为薄弱,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乡村振兴的正向作用可发挥的空间较小。反观西部地区,由于乡村概念比较重,而且乡村地区的发展也更为迫切的需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所以产生的作用效果会比中东部地区的明显。同时,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的重点帮扶区域也是一些深度贫困的地区,贫困发生率高,一般情况来说,这些区域二者之间的作用效果会更明显。

通过不同地区间影响的差异性分析,提出假设2如下:

H₂: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3.3.3 间接影响分析及假设

本文为了探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二者的相互影响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大小,来判断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方式,将以上两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来研究本文的中介效应。如下进行对应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的间接效应分析。经济发展为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相对应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会为当地发展经济提供便利,也能有更多的资本去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首先,如今社会发展中对数字化要求很高,移动支付、大数据平台、电商销售等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为群众提供了便利,另一面又给政府的推进工作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要想经济发展,必须融合数字化手段。尤其在乡村地区,由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较为不完善,很多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无法正常提供,此时可以借助数字金融手段,节约成本的同时降低传输难度,以此来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其次,产业发展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撑,可以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来拓宽融资渠道,并通过大数据分析,更好的匹配适合产业发展的资金,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于一些农牧产品的保险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也可以提供适合的农业保险产品,降低农民损失的风险,

不断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乡村地区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提供融资渠道,改善资金质量,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反作用于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从根源上提升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间接传导作用。

城镇化水平的间接效应分析。通常利用城镇化水平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成效,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高,所能得到的发展资源也越多,包括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生活等,在当前的时代发展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在城市发展,不仅能够带动自身价值的实现,同时也可以将优质的发展资源带回乡村,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能够连通城市和乡村,打破很多方面的界限,使得不少乡村发展可以融入到城市发展当中,在以往数字化技术不太发达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之间有着很大的屏障,信息交流以及资源流通渠道都不通畅,导致乡村地区获取发展资源的信息闭塞,错失很多发展机会。在提倡乡村地区全面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的今天,一方面可以借助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功能,不断打破城乡间的物理区分,更多具备城市功能的乡村地区可以进入城市化行列,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将城乡不同的发展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全面提升乡村地区的现代化水平。通过对两种中介效应的分析,结合本文 3.2 中的机理分析,具体传导路径如图 3-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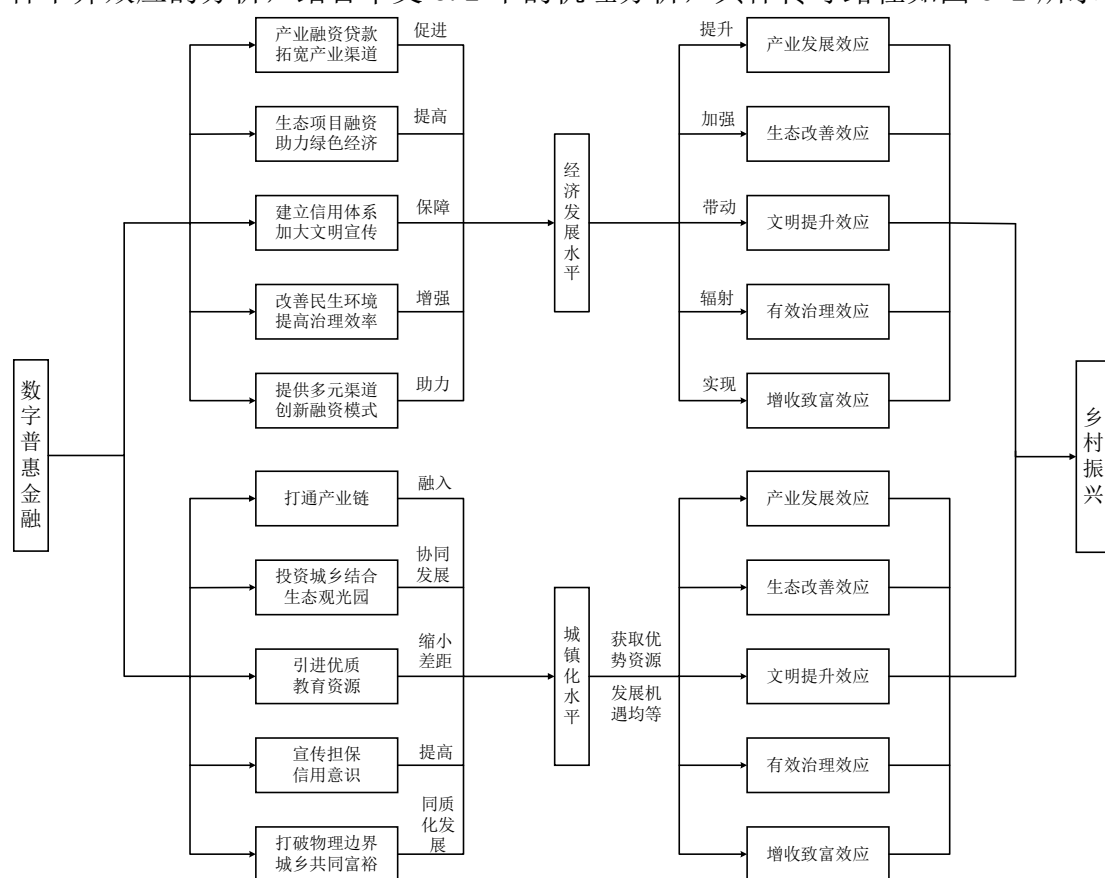


图 3-2 中介传导机制

通过以上两种间接机制的分析,提出假设 3 如下:

H₃: 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中有间接影响。

3.3.4 非线性影响分析及假设

在如今全民上网的新形势下,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完全颠覆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普惠金融在我国提出并实施的这几年,在提升乡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弥补了普惠金融发展中的短板,包括从支付、融资、理财、保险等与农民息息相关的方面都更加高效便捷。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断创新,“网红经济”、“直播经济”、“电商经济”等的模式出现,也不断的将乡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边界打破,资源分配越来越公平。但是从我国整体水平上来看,互联网水平在不同区域呈现出发展不一致的现状,经济发达地区的互联网水平远远高于偏远地区的互联网水平。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是完全依托于互联网来进行功能实现的,所以互联网普及率的高低也决定了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在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地区,由于网络限制以及应用技术水平实施困难等因素,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程度会有所降低,但是在互联网水平较高的地区,影响程度会显著增加。

基于以上互联网水平的作用分析,提出假设 4 如下:

H₄: 互联网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中有非线性影响。

第四章 乡村振兴指数的测算

本章节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主要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并查阅国家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方针，在政策性、理论性、合理性、数据可得性和科学性的原则上构建乡村振兴指数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和模糊评价法测算出全国 31 个省（市）的乡村振兴指数。此指数是后文实证分析的基础，提供实证分析数据的基础上也是联系上下文的纽带。

4.1 乡村振兴指数指标体系的建立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在充分考虑了乡村地区实际发展后提出的战略性政策，在建立指标体系时首先在政策层面上应该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农村产业发展条件，强化农村产业发展基础，给农民提供发展的内生动力，由此带动农村环保事业、文化建设、治理效率等的提高。所以本文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构建是从政策性的角度展开的，一方面考虑了国家的政策文件中提出的关于乡村振兴的五大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结合了本文第三章所提出的五大影响机理，具体如图 4-1 所示。其次，本文的二级指标构建主要从理论性上来考虑，在第三章所述的不完全信息理论、比较优势理论、长尾理论、金融排斥理论的基础上选取评价指标，并通过合理的内容梳理，找到对应的评判指标，具体对应内容如图 4-2 所示。再次，本文三级指标的建立是从科学性的角度上进行的考虑，因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产业发展是核心，生活富裕是目标，所以在构建时这两项所占比例会较大。乡村治理所占的比重最小，是因为在不断提升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人文素质也在不断提高，治理难度也在无形中降低。最后，指标说明是充分考虑了数据可得性来建立的，在查阅现有文献以及相关政策后，部分数据由于没有统计，根据相近度进行变量替换，以确保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综合来看指标体系的构建符合客观逻辑，本指标采用三级指标构建，每一级指标均严格按照政策要求与实际发挥作用的角度选取，指标说明均按照三级指标的内涵进行解释，并通过不断的调整使得指标体系更加完善。综上所述，本文关于乡村振兴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得以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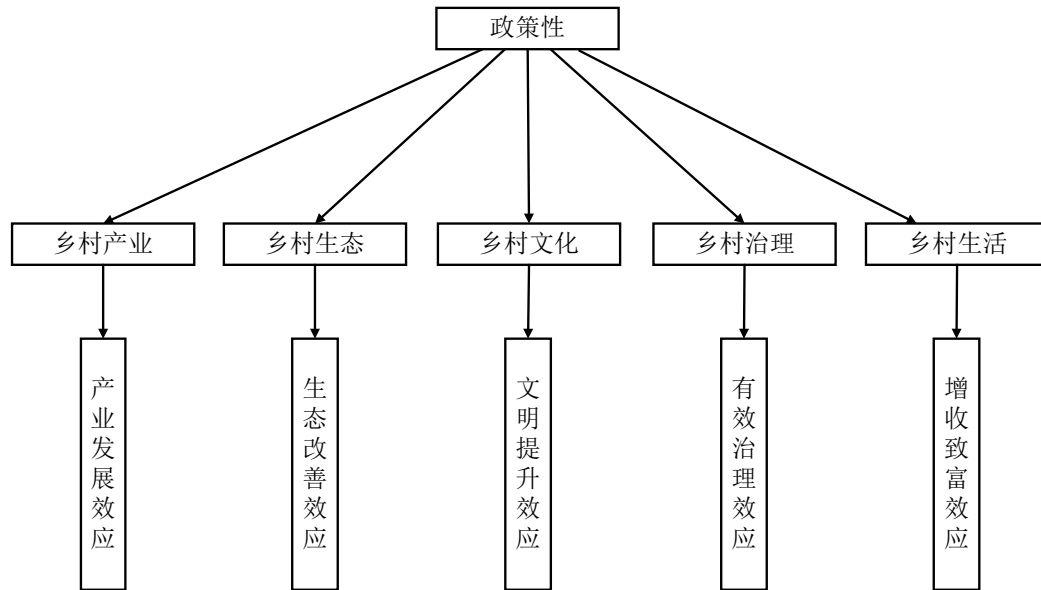


图 4-1 指标体系的政策性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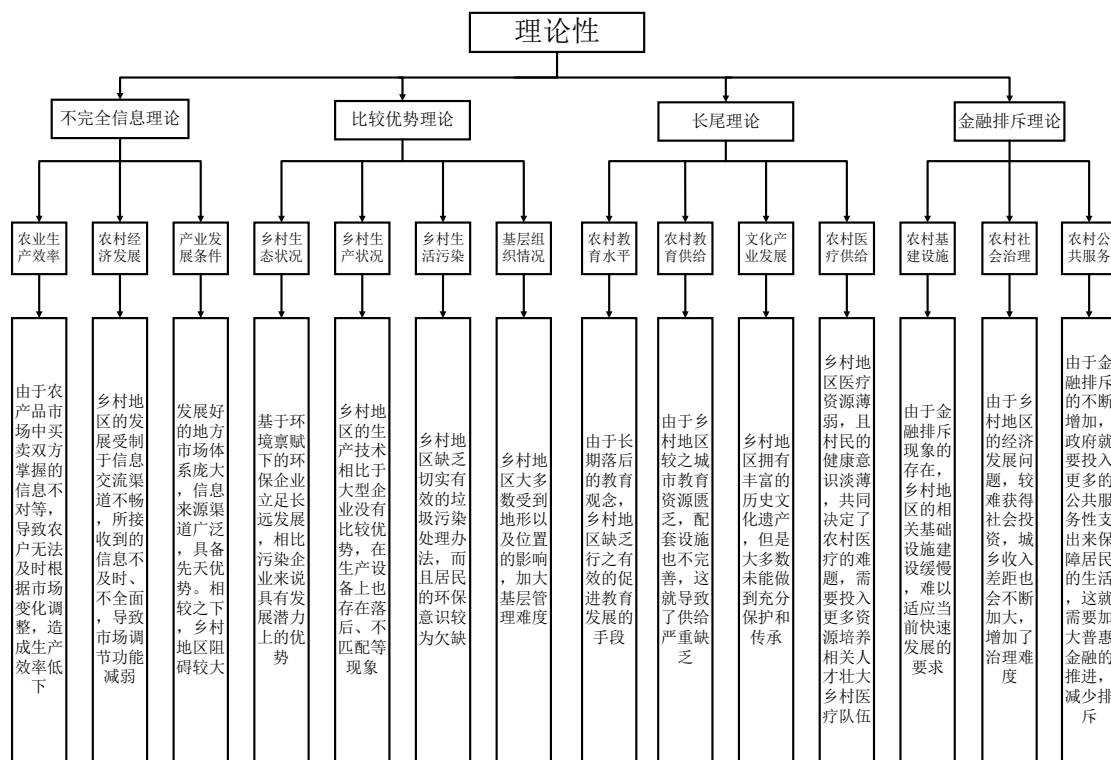


图 4-2 指标体系的理论性依据

4.1.2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本文对乡村振兴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基于政策性、理论性、数据可得性以及科学性、完整性等原则上综合考量而得出的，并从全面提升乡村振兴的五大方面出发，按照这五个方面对于乡村振兴的影响程度不同设置具有差别权重标准的衡量指标。在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也参考了熊正贤（2020）、张焱（2021）、毛

锦凰（2021）、吕承超和崔悦（2021）等的做法，强化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原则。由于在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是核心，所以在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乡村产业的指标权重较高，共有三个二级指标，九个三级指标来说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乡村生态、乡村文化和乡村治理分别用三个二级指标，三个三级指标来衡量；乡村生活的提升是乡村振兴的结果所在，也占有较高比重，所以用三个二级指标，八个三级指标来衡量。

4.1.3 指标体系的建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的乡村振兴指数的指标体系如表 4-1 所示。

表 4-1 乡村振兴指数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乡村产业 (A)	产业发展条件 (A1)	土地资源 (<i>Lr</i>)	有效灌溉面积 (千公顷)
		农村水电建设 (<i>Rhc</i>)	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时)
		农用机械资源 (<i>Fmr</i>)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人均粮食占有量 (<i>Pfa</i>)	粮食产量 (万吨) / 农村人口数
	农业生产效率 (A2)	劳动生产率 (<i>Lbp</i>)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
		土地生产率 (<i>Ldp</i>)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有效灌溉面积
		农业收入 (<i>Ai</i>)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农村经济发展 (A3)	投资收益 (<i>Ii</i>)	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人均收入 (<i>Pci</i>)	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乡村生态 (B)	乡村生态状况 (B1)	环境治理 (<i>Ep</i>)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千公顷)
	乡村生产状况 (B2)	资源再利用 (<i>Rr</i>)	太阳能热水器 (万平方米)
	乡村生活污染 (B3)	公共卫生 (<i>Ph</i>)	农村公共厕所数 (座)
乡村文化 (C)	农村教育水平 (C1)	农村教育普及率 (<i>Rep</i>)	农村普通高中毕业生数 (人)
	农村教育供给 (C2)	乡村教师数 (<i>Rt</i>)	农村学校专任教师数 (人)
	文化产业发展 (C3)	文化产业支出 (<i>Cie</i>)	农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 (元)
	基层组织情况 (D1)	基层组织数 (<i>Gon</i>)	村民委员会数 (个)
乡村治理 (D)	农村社会治理 (D2)	城乡收入差距 (<i>Uri</i>)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农村医疗供给 (E1)	乡村医疗卫生机构 (<i>Rhi</i>)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个)
		乡村医护人员 (<i>Rhw</i>)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 (万人)
乡村生活 (E)	农村基础设施 (E2)	互联网建设 (<i>Inc</i>)	农村宽带接入户数 (万户)
		电力建设 (<i>Epc</i>)	农村发电量 (万千瓦时)
		通信设备 (<i>Cd</i>)	农村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户)
		社会救济 (<i>Sr</i>)	农村特困救助供养机构数 (个)
	农村公共服务 (E3)	文化服务 (<i>Cs</i>)	乡镇文化站 (个)
		生活保障 (<i>Ls</i>)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农业农村部网站、Wind 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EPS 全球数据统计分析平台等，部分数据通过网页搜索而

来,在数据整理过程中由于部分数据的统计标准会随着年份推移发生变化,导致少量数据存在缺失现象,均通过计量运算进行数据填充。其中,农村公共厕所数由县城和乡镇的公共厕所数加总而来;农村普通高中毕业生数由于没有单独进行统计,故用全省高中毕业生数减去城区高中毕业生数得来;农村学校专任教师数由于没有单独进行统计,故用全省专任教师数减去城区学校专任教师数得来。

4.2 乡村振兴指数的测算

由于乡村振兴指数的测算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单纯依靠定量方法对其进行描述并不十分严谨。而模糊评价法作为一种定性解释与定量运算充分融合的方法,以模糊数学作为数理基础,通常在处理不确定问题时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它也具有权重难以确定的劣势。而熵权法是利用定量运算来确定权重的,是完全不受主观因素影响下的客观评价方法。本文考虑到两者的优势并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建立的乡村振兴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来测算出指数。

4.2.1 原始数据收集

评价指标体系是由 m 个样本组成,并用 n 个指标对整体做综合评价,从而列出评价系统的初始数据矩阵:

(1) 定评价因素集:

$$U=\{U_1,U_2,\dots,U_m\}, \text{ 即 } m \text{ 个评价指标体系} \quad (4-1)$$

(2) 定评价等级集:

$$P=\{P_1,P_2,\dots,P_n\}, \text{ 即 } n \text{ 个指标评价等级} \quad (4-2)$$

(3) 在 U 与 P 之间建立单因素评价,构建模糊评价矩阵 X

$$X=\begin{pmatrix} x_{11} & \cdots & x_{1n} \\ \vdots & \ddots & \vdots \\ x_{m1} & \cdots & x_{mn} \end{pmatrix}=\{x_{ij}\}_{m \times n} \quad (4-3)$$

(其中, $0 \leq i \leq m, 0 \leq j \leq n$)

4.2.2 数据处理

(1) 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的单位 and 数量级均不相同,所以为了避免对所测算的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以及防止出现零值而导致无法计算的现象。故用公式(4-4)对所搜集整理的数据做正向化处理:

$$x'_{ij} = \frac{x_{ij} - x_{min}}{x_{max} - x_{min}} + 0.0001 \quad ; \quad x'_{ij} = \frac{x_{max} - x_{ij}}{x_{max} - x_{min}} + 0.0001 \quad (4-4)$$

(x_{ij} 是第 i 个指标下的第 j 项数值, x_{max} 是第 j 项指标中的最大样本值, x_{min} 是第 j 项指标中的最小样本值, x'_{ij} 是标准化以后的数值)。若此指标为正向用 (4-4) 中左侧公式, 若为负向则用 (4-4) 中右侧公式。

(2) 计算对应指标的比重 y_{ij}

$$y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quad (0 \leq y_{ij} \leq 1) \quad (4-5)$$

(3) 计算对应指标的熵值 (s) 以及指标的效用值 (f)

利用公式 (4-6) 计算对应指标的熵值 (s) :

$$s_j = -K \sum_{i=1}^m y_{ij} \ln y_{ij} \quad (\text{其中 } K = \frac{1}{\ln m}) \quad (4-6)$$

利用公式 (4-7) 计算对应指标的效用值 (f)

$$f_j = 1 - s_j \quad (4-7)$$

(4) 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w_j = \frac{f_j}{\sum_{j=1}^n f_j} \quad (4-8)$$

(5) 计算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乡村振兴指数权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乡村产业 (A)	产业发展条件 (A1)	土地资源 (Lr)	0.0291
		农村水电建设 (Rhc)	0.0260
		农用机械资源 (Fmr)	0.0398
		人均粮食占有量 (Pfa)	0.0302
		农业生产效率 (A2)	0.0418
	农村经济发展 (A3)	劳动生产率 (Lbp)	0.0516
		土地生产率 (Ldp)	0.0436
		农业收入 (Ai)	0.0468
		投资收益 (Ii)	0.0371
		人均收入 (Pci)	0.0381
乡村生态 (B)	乡村生态状况 (B1)	环境治理 (Ep)	0.0232
	乡村生产状况 (B2)	资源再利用 (Rr)	0.0461
	乡村生活污染 (B3)	公共卫生 (Ph)	0.0650
乡村文化 (C)	农村教育水平 (C1)	农村教育普及率 (Rep)	0.0375
	农村教育供给 (C2)	乡村教师数 (Rt)	0.0232
	文化产业发展 (C3)	文化产业支出 (Cie)	0.0537
乡村治理 (D)	基层组织情况 (D1)	基层组织数 (Gon)	0.0193
	农村社会治理 (D2)	城乡收入差距 (Uri)	0.0310
乡村生活 (E)	农村医疗供给 (E1)	乡村医疗卫生机构 (Rhi)	0.0308
		乡村医护人员 (Rhw)	

续表 4-2 乡村振兴指数权重表

乡村生活 (E)	农村基础设施 (E2)	互联网建设 (<i>Inc</i>)	0.0536
		电力建设 (<i>Epc</i>)	0.0408
		通信设备 (<i>Cd</i>)	0.0526
	农村公共服务 (E3)	社会救济 (<i>Sr</i>)	0.0773
		文化服务 (<i>Cs</i>)	0.0212
		生活保障 (<i>Ls</i>)	0.0407

根据熵权法和模糊评价法所得出的各指标的权重,可以得到最终合成的乡村振兴指数,乡村振兴指数用字母 *Rei* 表示,其余各指标用上表中的代号,可以得出计算乡村振兴指数的公式如(4-9)所示:

$$\begin{aligned}
 Rei = & 0.0291Lr + 0.0260Rhc + 0.0398Fmr + 0.0302Pfa + 0.0418Lbp \\
 & + 0.0516Ldp + 0.0436Ai + 0.0468Ii + 0.0371Pci + 0.0381Ep \\
 & + 0.0232Rr + 0.0461Ph + 0.0650Rep + 0.0375Rt + 0.0232Cie \\
 & + 0.0537Gon + 0.0193Uri + 0.0310Rhi + 0.0308Rhw + 0.0536Inc \\
 & + 0.0408Epc + 0.0526Cd + 0.0773Sr + 0.0212Cs + 0.0407Ls
 \end{aligned} \quad (4-9)$$

将 31 个省份的各项指标值代入公式(4-9)中得出的乡村振兴指数如表 4-3 所示:

表 4-3 31 省(市)乡村振兴指数表

地区	省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东部地区	北京	0.6780	0.8101	0.7856	0.7612	0.7213	0.7251	0.6793	0.6884
	天津	0.4610	0.5515	0.5129	0.5692	0.5603	0.7750	0.7494	0.8136
	河北	0.3861	0.3917	0.3325	0.5216	0.6834	0.8468	0.8018	0.9257
	辽宁	0.5421	0.6270	0.6794	0.6952	0.5596	0.7659	0.7450	0.6928
	上海	0.7193	0.9766	0.8904	0.5714	0.4845	0.4511	0.7285	0.9148
	江苏	0.3031	0.4128	0.5194	0.5894	0.6709	0.8570	0.9282	1.0312
	浙江	0.6716	0.7133	0.5803	0.4322	0.6267	0.7898	0.9350	0.7584
	福建	0.8451	0.7215	0.7037	0.8125	0.5006	0.4616	0.4949	0.5207
	山东	0.3524	0.4325	0.5627	0.5971	0.6335	0.8301	0.9053	1.0841
	广东	0.3775	0.3822	0.4277	0.5905	0.5554	0.8147	0.9579	1.0379
	广西	0.2474	0.2804	0.4794	0.4678	0.6803	0.9291	0.8756	0.9617
	海南	0.3224	0.5854	0.5726	0.5496	0.6068	0.9472	0.9714	1.0869

续表 4-3 31 省（市）乡村振兴指数表

中部地区	山西	0.6288	0.8005	0.6033	0.6867	0.6598	0.7144	0.7806	0.6704
	吉林	0.4496	0.4628	0.3969	0.5671	0.5991	0.7467	0.9055	1.0640
	黑龙江	0.3566	0.4467	0.3533	0.4115	0.5350	0.7788	0.9817	1.0687
	安徽	0.2713	0.2888	0.5296	0.9145	0.8687	0.7319	0.8296	0.9529
	江西	0.5396	0.4702	0.5469	0.5100	0.5190	0.6806	1.0818	1.0919
	河南	0.3037	0.2776	0.3226	0.5371	0.7691	0.9350	1.0232	1.0903
	湖北	0.3010	0.4060	0.6372	0.7745	0.8848	0.8454	0.8516	1.0234
	湖南	0.3420	0.2557	0.2882	0.5343	0.9225	0.9096	1.0731	1.0997
	内蒙古	0.4758	0.5168	0.7347	0.8088	0.6628	0.6023	0.5954	0.5904
西部地区	重庆	0.2472	0.7298	0.7370	0.5452	0.5161	0.6223	0.7347	0.7146
	四川	0.2670	0.3968	0.5468	0.8141	0.7731	0.8984	0.9564	0.9772
	贵州	0.1833	0.3783	0.6586	0.7410	0.9211	0.9846	1.1444	1.2157
	云南	0.2017	0.2421	0.2961	0.4267	0.6721	0.9139	1.0731	1.1662
	西藏	0.1940	0.3413	0.4010	0.5500	0.5875	0.7847	0.9088	1.1312
	陕西	0.2946	0.4483	0.5447	0.6471	0.8258	0.8602	0.9352	0.9801
	甘肃	0.2930	0.3271	0.3879	0.3345	0.5474	0.7128	0.9754	1.1448
	青海	0.3690	0.4852	0.6571	0.3787	0.5567	0.8745	1.0436	1.1647
	宁夏	0.5513	0.5684	0.4230	0.3924	0.7592	0.8549	0.8217	0.9032
	新疆	0.6079	0.7084	0.7755	0.6341	0.4674	0.5958	0.8352	1.0423

4.3 乡村振兴指数的分析

4.3.1 我国乡村振兴水平不断提升

从图 4-3 可以看出我国乡村的发展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并且从 2017 年后，发展速度有所提升，原因是同期我国脱贫攻坚工作进入新阶段，除了个别深度贫困的地区，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任务，广大农民的生活品质稳步上升，有了可以发展产业的渠道和资源，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长期稳定的保证之后，开始丰富精神文化世界，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致力于发扬当地传统文化，并能够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发展旅游业等产业，通过

电商平台将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还吸引了更多的人慕名而来。此外,随着我国大力开展生态环境方面的整治行动,在社会层面上通过主流媒体全力引导环保理念,环保意识正不断的被重视起来。由于广大乡村地区地广人稀,未被开发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是长久以来,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乡村振兴概念被提出以来,对于这部分的保护力度加大,“乡村美,农民富”的理念深入人心。总体来说,我国的乡村振兴水平在不断提升,并在长期内稳步攀升,迈向协同发展的现代化。

4.3.2 乡村振兴水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从图 4-3 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指数均值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趋势明显,东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早期水平处于最高的位置,而后呈现出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的态势,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程度高,在我国还未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时候,东部地区的乡村地区已经借助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拥有较多发展资源,现代化程度较高。基于这些先天优势,乡村地区得到了和城市一样的发展机遇,再加上东部地区可以利用的地理区域很多,极少有不适应人类居住的大山沟壑,乡村和城市的边界较为扁平,并没有清晰的区分。反观西部地区的乡村发展趋势,早期内呈现发展起点低的态势,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后,有了很明显的转折,实现快速发展的路径。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前期西部地区深处内陆,大部分地区被群山环绕,山大沟深,交通极其不便利,很多发展机会和资源难以运送到当地,造成信息闭塞,发展机遇难求。同时,这些区域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不能及时掌握新技术、新方式,见识较少,导致很多地方还保留较为原始的劳作生产方式,效率低下且方式过于单一。所以,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后,再加上数字化程度的普及,西部地区抓住了发展机遇,积极的融合到新时代的发展浪潮当中,产业兴旺、人居环境优美、生产生活丰富多彩,农民有了新的面貌。综合考察中部地区,基本符合国家现状,发展水平处于整体的平均水平,并且稳步提升。所以,我国整体的乡村振兴水平呈现“西高-中平-东低”的格局,从分析结果和现实情况来看,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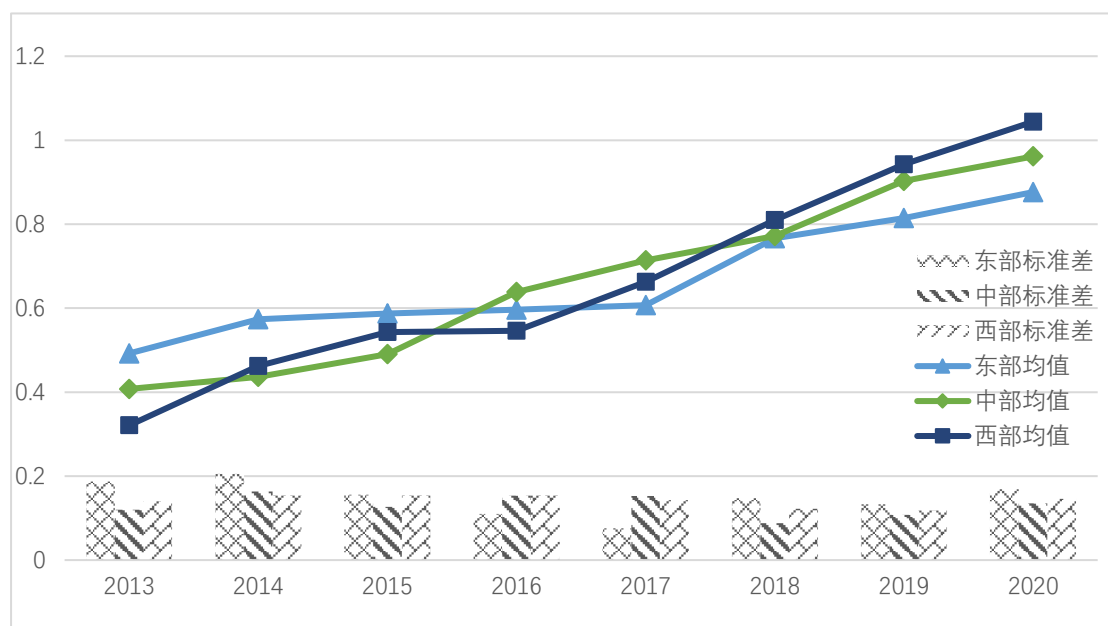


图 4-3 2013-2020 年我国乡村振兴发展趋势图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本章节在充分理解及分析前文的基础上,利用前文所做的指数进行本文的定量分析。本文在充分认识数据特征以及数据运行结果的基础上,利用计量模型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从线性、非线性的角度全面分析,线性分析包括二者之间直接的回归分析以及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作为中介变量时的影响分析,非线性分析是将互联网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做本文的门槛分析,并对所得的实证分析结果做稳健性检验。

5.1 研究设计

5.1.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分析的科学性,本文选取 2013-2020 年 31 省(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进行本文的实证分析。本文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农业农村部网站、国研网数据库、EPS 全球统计分析平台、各省的分年度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统计局网站等,部分数据通过网页搜索而来。由于本文所需数据较多,年份长,部分数据在统计过程中可能变换了度量单位,导致一少部分数据出现不完全的现象,均通过数学运算进行数据填充。使用 stata14.0、EViews8 和 Excel 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

5.1.2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指数 (Rei)。通过文献阅读以及相关官方文件对于乡村振兴概念的界定,本文在充分考虑了数据的政策性、理论性、科学性以及完整性后,从科学合理的角度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第四章所测算的指数进行表示。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 ($Difi$)。利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3-2020 年 31 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来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3) 中介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Eco)。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化方式降低了融资成本以及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成本,推动一些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加入创业、发展产业的行列,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收入,也在社会层面提升了当地整体的经济发展水

平，从而为该地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第一个中介效应的研究值。

城镇化水平（*Urb*）。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在地区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主要是可以扩展资源的获取渠道，提升发展质量。本文以某地区城镇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说明城镇化水平，作为第二个中介效应的研究值。

（4）门槛变量

互联网发展水平（*Icd*）。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乡村发展环境较以往有了很大提升，网络的发展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全民网络时代的到来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通过网络的自由发展，人们开始探索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们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来带动当地经济产业多渠道并行，来获取网络带给人们的阶段性红利。本文运用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量来说明农村互联网的发展水平，并将其作为门槛变量来做门槛分析。最后，通过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下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发展的建议。

（5）控制变量

为了使本文的实证研究更加充分，还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影响乡村振兴发展的控制变量，来强化实证分析的可靠性。在指标选取时，本文参考了李季刚和马俊（2021）、葛和平和钱宇（2021）文章中的指标选取，具体见表 5-1。乡村地区文化教育水平（*Rce*）的选取依据为乡村振兴中对于乡村文明提升以及文化繁荣的要求；农民生活水平（*Fsi*）的选取依据为乡村振兴中对于生活富裕的要求；电商发展水平（*Ecd*）的选取依据为乡村振兴中对产业发展、有效治理以及生态环保的要求；产业结构（*Is*）的选取依据为乡村振兴中对产业发展的要求；政府支农力度（*Afe*）的选取依据为乡村振兴中五大方面的共同要求，在发展产业、保护生态、创建文明、有效治理以及增收致富中均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不管是从政策方面倾斜还是财政方面的扶持，都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邮递业发展水平（*Pcd*）的选取依据为乡村振兴中对产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要求。

表 5-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及测算方式
被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指数	<i>Rei</i>	通过乡村振兴的定义制定评价指标体系，
			并用模糊评价法和熵权法计算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i>Difi</i>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指数
中介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i>Eco</i>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城镇化水平	<i>Urb</i>	城镇人口总数/总人口数

续表 5-1 变量说明

门槛变量	互联网发展水平	<i>Icd</i>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乡村地区文化教育水平	<i>Rce</i>	初中师生比
	农民生活水平	<i>Fsi</i>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元/人）
	电商发展水平	<i>Ecd</i>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产业结构	<i>Is</i>	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政府支农力度	<i>Afe</i>	地区农林支出总额/地区财政支出总额
	邮递业发展水平	<i>Pcd</i>	农村投递线路（公里）
控制变量			

5.2 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 31 省（市）2013-2020 年的 248 个样本作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量较大，提高分析的准确度，比较适合进行动态过程研究。基于前文提出的四个假设，参考相关文章，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5.2.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固定效应模型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运用前文测算出来的乡村振兴指数，探究本文第三章 3.3 节所提出的影响路径及研究假设。本文在进行直接影响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了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 Hausman 统计值为 20.7，对应的 P 值为 0.0042，所以在本文的模型选择通过检验结果确定以固定效应模型为本文的基础模型，并对结果进行一一对应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Rei_{it} = \beta_0 + \beta_1 Difi_{it} + \beta_2 Rce_{it} + \beta_3 Fsi_{it} + \beta_4 Ecd_{it} + \beta_5 Is_{it} + \beta_6 Afe_{it} + \beta_7 Pcd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1)$$

其中，下标 *i* 代表个体（ $1 \leq i \leq n$ ）即为 31 个样本量，下标 *t* 代表时间（ $1 \leq t \leq T$ ）即为 2013-2020 年。 β_1 、 β_2 、 β_3 、 β_4 、 β_5 、 β_6 、 β_7 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 β_0 表示截距项； μ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γ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5.2.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的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检验本文的间接影响，本文选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论证，其中的中介变量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具体模型如下：

$$Rei_{it} = \alpha_0 + \delta_1 Difi_{it} + \delta_2 Eco_{it} + \alpha_1 Rce_{it} + \alpha_2 Fsi_{it} + \alpha_3 Ecd_{it} + \alpha_4 Is_{it} + \alpha_5 Afe_{it} + \alpha_6 Pcd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2)$$

$$Eco_{it} = \beta_0 + \delta_3 Dif_{it} + \beta_1 Rce_{it} + \beta_2 Fsi_{it} + \beta_3 Ecd_{it} + \beta_4 Is_{it} + \beta_5 Afe_{it} + \beta_6 Pcd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3)$$

$$Rei_{it} = \alpha_0 + \omega_1 Dif_{it} + \omega_2 Urb_{it} + \alpha_1 Rce_{it} + \alpha_2 Fsi_{it} + \alpha_3 Ecd_{it} + \alpha_4 Is_{it} + \alpha_5 Afe_{it} + \alpha_6 Pcd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4)$$

$$Urb_{it} = \beta_0 + \omega_3 Dif_{it} + \beta_1 Rce_{it} + \beta_2 Fsi_{it} + \beta_3 Ecd_{it} + \beta_4 Is_{it} + \beta_5 Afe_{it} + \beta_6 Pcd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5)$$

在公式 (5-2) - (5-5) 当中, Eco 表示中介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Urb 表示中介变量-城镇化水平。本文利用逐步回归法做中介效应分析, 具体检验步骤如下:

(1) 检验模型 (5-1) 中核心解释变量 $Difi$ 的系数 β_1 显著性, β_1 代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总效应。

(2) 分步检验模型 (5-2) - (5-5) 中中介变量 Eco 和 Urb 的系数 δ_2 和 ω_2 , 以及以中介变量为因变量的解释变量 $Difi$ 的系数 δ_3 和 ω_3 的显著性, 如果以上回归系数 δ_2 、 ω_2 、 δ_3 、 ω_3 均显著, 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 需进行第四步分析; 若 δ_2 、 ω_2 、 δ_3 、 ω_3 中有一个及以上的系数出现不显著的情况时, 则进行以下第三步分析。

(3) 利用 bootstrap 法检验系数乘积 ($H_0: \delta_2\delta_3=0, \omega_2\omega_3=0$) 是否通过显著性检验, 如果通过, 则说明本文的验证中存在中介效应, 继续进行第四步分析; 如果没有通过, 则说明本文的验证中不存在中介效应, 分析在此停止。

(4) 检验 (5-2) 和 (5-4) 中核心解释变量 $Difi$ 的系数 δ_1 和 ω_1 是否显著, 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具体中介效应比例通过系数乘积进行测算得出; 若显著性检验未通过, 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5) 利用相关系数的符号进行中介效应的类型判断, 若 $\delta_2\delta_3$ 与 δ_1 、 $\omega_2\omega_3$ 与 ω_1 出现同向的符号, 说明属于部分中介效应; 若出现反向的符号, 说明属于遮掩效应。

5.2.3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面板门槛模型

互联网的应运而生以及快速发展, 为各个行业带来了机遇, 不仅提升了效率也加快了信息融合。我国在各个工作会议中, 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要将国家经济发展融入到数字经济中。数字经济的应运而生, 扩大了发展范围, 拓宽了发展路径, 提高了发展效率。金融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 数字化发展的优势尽显, 将二者充分融合则会产生更加有利的发展机遇。要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就必须加强互联网建设水平。目前按照互联网发展的情况来看, 存在地区性的差异, 在我国东南沿海, 数字化程度较高, 但是在西北内陆地区, 尚存一些偏远地区网络化并不普及, 造成一定的“数字鸿沟”现象的出现。基于

此分析,本文借鉴李季刚(2021)等的做法,探究互联网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过程中产生的非线性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Rei_{it} = \alpha_0 + \theta_1 Difi_{it} \cdot I(Icd_{it} \leq \gamma_1) + \theta_2 Difi_{it} \cdot I(\gamma_1 \leq Icd_{it} \leq \gamma_2) + \dots + \theta_{n-1} Difi_{it} \cdot I(\gamma_{n-2} \leq Icd_{it} \leq \gamma_{n-1}) + \theta_n Difi_{it} \cdot I(Icd_{it} \leq \gamma_n) + \alpha_1 Rce_{it} + \alpha_2 Fsi_{it} + \alpha_3 Ecd_{it} + \alpha_4 Is_{it} + \alpha_5 Afe_{it} + \alpha_6 Pcd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6)$$

公式(5-6)中 $Difi$ 为核心解释变量,下标 i 表示 31 省(市), t 代表年份。 Icd (互联网发展水平) 为门槛变量, $I(\cdot)$ 表示示性函数, γ 为门槛值。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5.3.1 面板数据检验

首先利用 `stata` 进行面板数据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的数据集为强面板数据。其次,对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ADF)检验,验证结果显示 P 值为 0.0007,拒绝原假设,说明本文时间序列数据完全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继续进行如下分析。最后,对数字普惠金融($Difi$)和乡村振兴指数(Rei)画出散点图(图 5-1)如下,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相关趋势,以此为基础可以进行下面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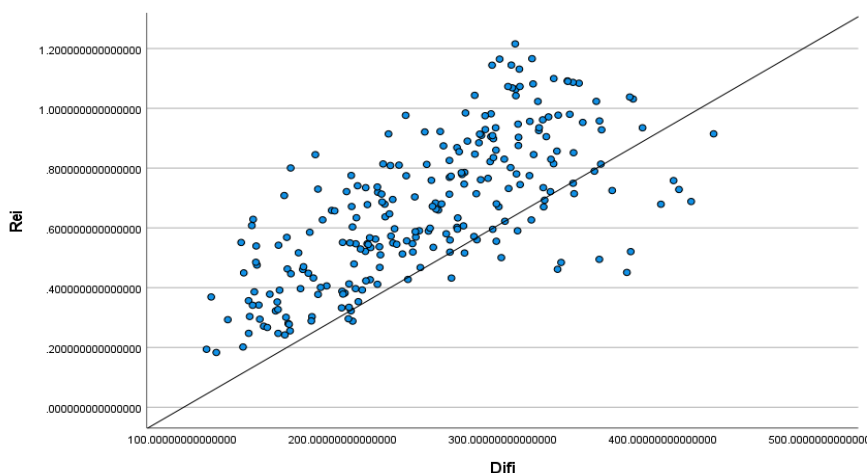


图 5-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散点图

5.3.2 基准回归分析

首先对假设 1 进行分析验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分别对模型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和依照模型(5-1)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后,得到如表 5-2 的回归结果。表 5-2 中第(1)列显示的是基础线性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是显

著的。第(2)列显示的是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会使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提升0.0028个单位,验证假设1是正确的。

其次,分析各控制变量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乡村地区文化教育水平(*Rce*)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乡村地区文化教育水平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具有正向推动的作用。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乡村地区整体的人文素质,快速接受新时代高科技产品的投入和运用,与新兴产业充分融合;另一方面可以扩大人才培养范围,让更多的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返乡工作,支持家乡发展,从而可以从根源上振兴乡村发展,改善乡村地区缺乏知识教育的风貌。

农民生活水平(*Fsi*)的回归系数显示为正值,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乡村振兴的本质目标是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本文所阐述的农民生活水平是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来衡量的,所以在乡村地区的发展当中应当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为目的,不断完善相应的政策机制。一方面,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其他各方面的水平,例如文化教育、医疗保障、社会治安等;另一方面,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长期巩固乡村振兴发展成果。由此,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赋能乡村振兴,保障乡村振兴成果形成长足发展。

电商发展水平(*Ecd*)的回归系数显示为负值,但不显著,说明目前的电商发展水平对于乡村振兴还不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还会存在负面影响。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一些成熟的电商平台都是由较好的团队运营,而当前乡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健全,农民还未能很好的融入这个平台。很多偏远农村地区网络平台的搭建成本高、难度大,电商平台的信用体系也未能系统的规范。所以,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的电商发展水平还没有很成熟,不能很好的融入到乡村振兴的蓝图中。

产业结构(*Is*)的回归系数显示为正值,并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产业发展能够明显促进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的总方针里,产业兴旺是放在第一位的,只有稳定的发展产业,才有振兴乡村的长足动力。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可以更好的适应当代乡村地区的发展需要,同时使得资源错配问题减少,从而保障产业发展形势。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要不断地结合当前市场变动情况,用发展的眼光利用好当地的优势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将产业结构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更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政府支农力度(*Afe*)的回归系数显示为正值,但不显著,说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已经不能像脱贫攻坚时期那样单纯依靠政府的资金帮扶,依托各种农业补助来鼓励农民进行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更重要的激发群众的内生

动力,从根源上开拓经济发展的途径,而不是一味的等待政府的帮扶、支持。但是政府的一部分帮扶也会对乡村振兴产生促进作用,例如,引进优势项目、拨付基础设施建设款项、吸引投资等,成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助推器。

邮递业发展水平(Pcd)的回归系数显示为负值,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邮递业水平还不能充分的促进乡村振兴进程。本文选取的衡量邮递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农村投递线路,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有一些偏远地区还未能真正实现快递“村村通”,不少人还停留在传统的购物方式,不能够和网购平台很好的融合。此外,农村地区的邮递业服务网络不够普及,相对于现存的村级道路,服务网点还是太少,不能满足如今发展趋势。所以,在本文能够获取的数据结果上来看,邮递业发展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乡村振兴的发展节奏,应大力加强发展力度,发挥邮递业的推动作用。

表 5-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Dift$	0.0026*** (6.09)	0.0028*** (6.68)
Rce	0.107*** (3.66)	0.113*** (3.68)
Fsi	0.186*** (4.45)	0.098** (1.94)
Ecd	0.037 (0.78)	-0.049 (-0.84)
Is	0.044 (1.19)	0.076** (1.93)
Afe	0.043 (1.28)	0.036 (1.000)
Pcd	-0.028 (-0.98)	-0.063*** (-2.07)
Con	0.05 (0.79)	-0.135* (-1.66)
个体效应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R^2	0.559	0.61
N	248	248

(注: ***, **, *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里为 t 值, 下表相同。)

5.3.3 区域异质性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基本印证了前文的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均显著且正向,并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其中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同时不同影响因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方向具有各自的差异。例如,乡村地区文化教育水平(*Rce*)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也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整体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具有较好的教育资源,所以整体上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也显著推动乡村振兴。政府支农力度(*Afe*)对西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对于东部地区 and 中部地区却存在负向作用且不显著。这是由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东部地区 and 中部地区来说落后,尤其乡村地区,很多地方深处大山,交通以及通讯等发展缓慢,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很多方面的发展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是中东部地区具有较好的发展资源以及有利的地理位置,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支持,反倒会给自身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邮递业发展水平(*Pcd*)对东部地区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却具有负面影响。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整体面积小,城市群较为集中,而且邮递距离短,邮递业发展成熟,然而中西部地区却由于交通不发达,邮递业发展缓慢,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还未能很好体现。

表 5-3 分区域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i>Difi</i>	0.0012*** (2.78)	0.0032*** (3.4)	0.0032*** (3.83)
<i>Rce</i>	0.19*** (4.3)	0.073 (1.39)	0.031 (0.61)
<i>Fsi</i>	0.082 (1.52)	-0.029 (-0.24)	0.046 (0.33)
<i>Ecd</i>	0.069 (0.84)	0.032 (0.29)	-0.037 (-0.54)
<i>Is</i>	0.056 (0.88)	0.044 (0.75)	0.079 (1.29)
<i>Afe</i>	-0.004 (-0.08)	-0.086 (-1.35)	0.175*** (2.58)
<i>Pcd</i>	0.02 (0.38)	-0.101* (-1.87)	-0.014 (-0.27)
<i>Con</i>	0.131 (1.15)	-0.026 (-0.17)	-0.195 (-0.39)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²	0.509	0.671	0.767
<i>N</i>	96	72	80

5.3.4 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模型（5-2）-（5-5）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5-4 所示，从上一小节得知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Difi*）的回归系数 β_1 显著为正。下面来逐一分析其他变量的系数。

（1）经济发展水平（*Eco*）的中介效应。表 5-4 显示，第（1）列中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 δ_1 、 δ_2 均显著，第（2）列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 δ_3 也显著，并且数字普惠金融（*Difi*）每提高 1 个单位，经济发展水平就提高 0.0023 个单位，且 $\delta_2\delta_3$ 与 δ_1 的符号都为正。所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在本文的研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通过 stata 进行 sobel 检验可得，经济发展水平（*Eco*）在本文验证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比例为 22.4%。综上可知，经济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经济水平的提升可以更大范围内发展数字经济，有实力购进更多现代化技术，从而吸收更多的金融资产，提高金融发展的信用水平，获取更多优质资产运用到农村产业中。从资金源头上把农村经济搞活，使农民有长足发展。

（2）城镇化水平（*Urb*）的中介效应。表 5-4 显示，第（3）列中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化水平的系数 ω_1 、 ω_2 均显著，第（4）列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 ω_3 也显著，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Difi*）每提高 1 个单位，城镇化水平增加 0.0029 个单位，且 $\omega_2\omega_3$ 与 ω_1 的符号相同，都为正。所以说明城镇化水平在本文的研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通过 stata 进行 sobel 检验可得，城镇化水平（*Urb*）在本文验证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比例为 56.42%，具有较高的比例。综上可知，城镇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可以使得乡村地区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发展资源和发展途径，从而扩大发展版图。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相关人才加入乡村建设的队伍，不断为乡村地区发展注入活力，改善乡村地区产业结构，提高技术进步水平。

表 5-4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i>Rei</i>	<i>Eco</i>	<i>Rei</i>	<i>Urb</i>
<i>Difi</i>	0.0028*** (4.63)	0.0023*** (2.96)	0.0015*** (3.55)	0.0029*** (8.9)
<i>Eco</i>	0.145* (1.76)			
<i>Urb</i>			0.296*** (5.01)	
<i>Rce</i>	0.107* (1.96)	0.038 (0.088)	0.087 (1.62)	0.089*** (3.04)
<i>Fsi</i>	0.079 (1.11)	0.127 (1.66)	0.058 (0.9)	0.238*** (5.4)

续表 5-4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i>Ecd</i>	-0.044	-0.03	-0.059	0.144***
	(-0.98)	(-0.45)	(-1.34)	(2.85)
<i>Is</i>	0.14**	-0.444***	0.033	0.115***
	(2.54)	(-4.01)	(0.54)	(3.08)
<i>Afe</i>	0.018	0.123***	0.036	0.002
	(0.39)	(3.24)	(0.83)	(0.06)
<i>Pcd</i>	-0.076	0.088**	-0.052	-0.001
	(-1.45)	(2.22)	(-1.02)	(-0.03)
<i>Con</i>	-0.128	-0.048	0.102	-0.584
	(-1.16)	(-0.23)	(0.87)	(-8.64)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²	0.62	0.766	0.637	0.816
<i>N</i>	248	248	248	248

5.3.5 门槛效应分析

根据模型（5-6）进行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 5-5 所示，可以看出将互联网发展水平（*Icd*）作为门槛变量时，单一门槛的 P 值为 0，说明在 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 P 值显示过大，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将互联网发展水平（*Icd*）作为门槛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同时，可以从表 5-6 中看出，单一门槛的估计值为 0.444，且 95%置信区间为[0.4017, 0.4509]。

表 5-5 门槛显著性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变量模型	F 统计量	P 值	临界值		
				10%	5%	1%
<i>Icd</i>	单一门槛	29.65	0.000	13.448	15.615	20.934
	双重门槛	7.34	0.158	8.699	10.390	13.779
	三重门槛	1.95	0.838	8.814	10.556	15.168

表 5-6 单一门槛估计值

门槛变量	门槛数	门槛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i>Icd</i>	单一门槛	0.444	[0.4017, 0.4509]

从表 5-7 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所处的数值区间不同时，其对乡村振

兴的影响会呈现出一定的非线性特征。当数字普惠金融 ($Difi$) 的系数低于单一门槛值 0.444 时, 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较低时, 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系数为 0.0014, 并且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进程。当数字普惠金融 ($Difi$) 的系数高于单一门槛值 0.444 时, 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较高时, 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系数为 0.0016, 并且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会加速促进乡村振兴的进程。综上所述, 数字普惠金融在以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 跨过第一门槛值时, 正向促进作用加速, 呈现出非线性影响。互联网的应用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发展的前提, 其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发挥着强大的基础性作用, 电商发展、网络经济、信息搜集都离不开互联网平台的搭建, 所以要大力普及互联网的使用, 实现“网络村村通”, 打破惠农“最后一公里”。

表 5-7 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95%置信区间
$Difi_{it-1} (Icd_{it} \leq \gamma)$	0.0014***	0.0003	4.83	0.000	[0.0008, 0.0020]
$Difi_{it-1} (Icd_{it} > \gamma)$	0.0016***	0.0003	6.08	0.000	[0.0011, 0.0021]
Rce	0.062**	0.031	2.00	0.047	[0.001, 0.122]
Fsi	0.106**	0.048	2.22	0.028	[0.0118, 0.2009]
Ecd	-0.051	0.055	-0.93	0.355	[-0.1606, 0.0578]
Is	0.058	0.039	1.49	0.139	[-0.019, 0.136]
Afe	0.043	0.034	1.24	0.215	[-0.025, 0.111]
Pcd	-0.053*	0.029	-1.83	0.069	[-0.111, 0.004]
Con	0.096	0.093	1.04	0.300	[-0.086, 0.279]
R^2	0.653				

5.4 稳健性检验

5.4.1 替换模型

为了验证本文的论证结果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能通过解释, 本文将模型替换为分位数回归对前文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分别取 0.1、0.25、0.5、0.75、0.9 的分位数对本文的研究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5-8 所示。可以看出, 在第 0.1、0.25、0.5、0.75、0.9 的分位数下,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均为

正向显著,并且在分位数逐渐增大的过程中,影响系数基本呈现上升的趋势,动态轨迹的正向作用明显,其中在第 0.25 分位数下,影响系数最大,说明在这个阶段二者的影响作用最大。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关系在第 0.1 到第 0.9 分位数之间一直存在,这加强了前文的论证结果,使本文的实证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表 5-8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1) QR-10	(2) QR-25	(3) QR-50	(4) QR-75	(5) QR-90
<i>Difi</i>	0.0011*** (2.39)	0.0020*** (5.39)	0.0017*** (3.82)	0.0017*** (3.11)	0.0018*** (4.47)
<i>Rce</i>	0.1167** (2.44)	0.1050*** (2.86)	0.1179** (2.45)	0.0376 (0.63)	0.0519 (1.09)
<i>Fsi</i>	0.1465** (2.32)	0.1404** (2.34)	0.1966*** (2.99)	0.1974*** (2.97)	0.2413*** (3.88)
<i>Ecd</i>	0.0113 (0.14)	-0.0113 (-0.19)	0.0258 (0.37)	0.0981 (1.22)	0.0516 (0.85)
<i>Is</i>	-0.0484 (-0.73)	0.0161 (0.26)	0.0194 (0.41)	0.0466 (0.9)	0.1513*** (3.73)
<i>Afe</i>	0.0469 (0.82)	-0.0116 (-0.27)	0.0715* (1.70)	0.0095 (0.18)	-0.0305 (-0.74)
<i>Pcd</i>	-0.0391 (-1.00)	-0.0600 (-1.33)	-0.0465 (-0.97)	-0.0287 (-0.69)	0.0374 (1.07)
<i>Con</i>	0.0658 (0.73)	-0.0631 (-0.61)	0.0302 (0.36)	0.1664 (1.62)	0.1583** (2.07)
<i>R</i> ²	0.5221	0.5365	0.5291	0.4616	0.4605
<i>N</i>	248	248	248	248	248

5.4.2 替换变量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指数 (*Rei*) 替换为产业发展 (*Id*), 重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做基础回归, 所得到的结果如表 5-9 所示, 产业发展用乡村地区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衡量, 重点想突出产业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地位, 乡村要发展, 产业必先行。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发展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 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 1 单位, 产业发展提高 0.0032 个单位, 对于各控制变量来说, 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也各有不同, 但整体与本文的基准回归具有一致的结论, 充分证明了本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表 5-9 产业发展 (*Id*) 回归结果

变量	<i>Id</i>
<i>Difi</i>	0.0032*** (5.26)
<i>Rce</i>	0.1362*** (2.99)
<i>Fsi</i>	0.2987*** (3.99)
<i>Ecd</i>	-0.0179 (-0.21)
<i>Is</i>	0.3375*** (5.78)
<i>Afe</i>	-0.0657 (-1.23)
<i>Pcd</i>	-0.0415 (-0.91)
<i>Con</i>	-0.7289*** (-6.04)
个体效应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R^2	0.5411
<i>N</i>	248

5.4.3 内生性问题

为了从不同角度验证本文的实证结果,进一步利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并且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对各解释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统计软件的运行结果如表 5-10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Difi*)对乡村振兴(*Rei*)的影响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 1 单位时,会使乡村振兴水平提高 0.0016 个单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因为在滞后一期数据后,本文的正向促进关系并未发生改变,使本文验证结果具有可靠性和科学性。

表 5-10 GMM 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值	P 值	95%置信区间
<i>Difi-1</i>	0.0016	0.0003	5.90	0.000	[0.0011, 0.0021]
<i>Rce</i>	0.1236	0.0344	3.59	0.000	[0.0562, 0.1911]
<i>Fsi</i>	0.1766	0.0432	4.09	0.000	[0.0920, 0.2613]

续表 5-10 GMM 结果

<i>Ecd</i>	0.0349	0.0504	0.69	0.489	[-0.0639, 0.1337]
<i>Is</i>	0.0388	0.0372	1.04	0.297	[-0.0341, 0.1116]
<i>Afe</i>	0.0390	0.0341	1.14	0.254	[-0.0279, 0.1059]
<i>Pcd</i>	-0.0272	0.0329	-0.83	0.407	[-0.0916, 0.0372]
<i>Con</i>	0.1077	0.0565	1.91	0.057	[-0.0031, 0.2186]

5.4.4 中介效应的 sobel 检验

为了保证中介效应逐步回归的准确性,本文采用 sobel- Goodman 检验对本文的中介效应做稳健性检验。首先是对经济发展水平 (*Eco*) 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11 所示,逐步回归的系数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充分验证了中介效应逐步回归结果的正确性,经济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中起到了间接作用的效果,中介效应存在并且显著。

表 5-11 *Eco* 的 sobel 检验结果

	系数	标准误	Z 值	P> Z
sobel	0.00054077	0.00016824	3.214	0.00130777
Goodman-1	0.00054077	0.00016853	3.209	0.0013332
Goodman-2	0.00054077	0.00016795	3.22	0.00128266

其次是对城镇化水平 (*Urb*) 的中介效应进行逐步回归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12 所示,可以看出,检验结果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充分验证了中介效应逐步回归的结果的正确性,城镇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中起到了间接作用的效果,中介效应存在并且显著。综上,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并且结果具有可信度。

表 5-12 *Urb* 的 sobel 检验结果

	系数	标准误	Z 值	P> Z
sobel	0.00136232	0.00019556	6.966	3.252e ⁻¹²
Goodman-1	0.00136232	0.00019577	6.959	3.432e ⁻¹²
Goodman-2	0.00136232	0.00019534	6.974	3.081e ⁻¹²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首先通过分位数回归在第 0.1 分位数、第 0.25 分位数、第 0.5 分位数、第 0.75 分位数和第 0.9 分位数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显著。其次,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继续做本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是显著

的。再次，本文通过广义矩估计方法并对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对本文的结果进行分析，以避免本文的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显著，通过以上两种检验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结果进行加强处理，确保本文结论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最后，用 *sobel* 检验的方法对本文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均显著，说明中介效应存在。综上，本文的实证结果均具有稳健性。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6.1.1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大力提倡以及逐渐普及,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结果显示影响系数不是特别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近几年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完成,不少乡村地区刚摆脱贫困,还未能马上融入现代化的数字社会,金融领域的一些常规知识在乡村地区也很匮乏,乡村地区的“数字鸿沟”现象还十分严重;第二,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远远不能够满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要求,很多原有计划被迫放弃;第三,数字化风险较大,目前还没有成熟的体系去防范和化解,再加上农村金融本身具有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其发展;第四,如果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将不能解决一系列技术、教育上的问题,可能会给其进一步发展带来制约效应,甚至会出现更加深刻的金融排斥。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确实给乡村地区的群众带去了发展的机遇,不少致力于创业、发展产业的农村居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得到融资,并获得信息渠道,更好的发展经济。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对接环保项目,推进“美丽乡村”生态建设,并通过推广普及金融知识来提高乡村地区居民对信用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同时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扩大交流面,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效率。总的来说,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正好能够对应到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做到为百姓谋实惠、带去好处,打通乡村工作“最后一公里”,但是对一些固有的内部局限应该具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在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考虑到其影响,通过更多灵活的方式予以化解和防范。

6.1.2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本文通过分区域对数据进行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程度,其中对于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是最大的,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空间较大,随着近几年的快速普及,极大的推动了乡村振兴的水平。同时,又由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乡村概念较东部地区重,乡村人口较多且发展缓慢,所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效用水平较东部地区高。

6.1.3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间接影响

本文通过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间接影响

和非线性影响。首先是中介效应,本文分别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均在本文研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例分别为 22.4%和 56.42%。从检验结果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作用比例较小,但是城镇化水平的中介作用比例较大,这恰好印证了前文的论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二者的作用力度反倒减弱,作用效用减小,其内生发展动力足够支撑其各方面水平的提升,所以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大。反观城镇化水平,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高,越能够在二者的相互影响中起到促进作用,因为这些地区往往具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条件,所以数字普惠金融在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为有需要的人群与企业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拓宽了资金融通渠道,为乡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与活力,从而提升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再反作用于乡村地区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提升、治理效率、生活水平等各个方面,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此外,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为乡村地区居民提供发展平台、投资咨询、扩大宣传等可以全面提升我国城镇化水平,使得乡村地区的人们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发展资源,从而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水平。最后,本文利用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系数在跨过 0.444 时表现出加速促进作用,所以要不断提升互联网建设力度,更多的将其优势发挥于乡村振兴战略中。

6.2 政策建议

6.2.1 优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一个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所以要从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力度、保障农民消费者权益、优化农村金融监管、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等方面,优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环境。首先,金融机构应该从适应当地产业发展需要出发推出适合的金融产品来供农民选择,优化保险品种,切实保障农民消费者的权益,降低金融投资的风险。其次,需要不断平衡风险与收益,建立适度、合理的监管政策,并不断健全监管的长效机制。最后,不断打破农村与城市的内在边界,使农村地区享受到和城市地区一样的优势资源,构建多层次发展平台。

6.2.2 制定农村发展政策要因地制宜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经济、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均存在各种差异性,所以在制定发展政策时也要因地制宜。对于深处内陆的西部地区来说,急需金融机

构完善线上供应链融资体系,关键在于延长物流到村距离,加强邮递业发展水平。这样不仅可以借助线上供应链平台简化部分业务流程,也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将电商平台和线上运营的模式加入产业链金融中,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扩大发展路径。对于沿海的东部地区来说,应该加强农业科技人才的培育,着力开发与农业相关的高科技产品,应用于乡村发展中。

6.2.3 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推进乡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就是要充分保证其实施,首先,完善乡村地区信用体系对金融机构更加大力支持“三农”工作、缓解金融排斥现象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和信用基础,扩大信用信息采集的覆盖面,并统一评价标准,加强征信系统的数据采集规范性,形成数字化、多元化、全覆盖的征信体系。同时,利用主流媒体的正向引导作用,加强乡村地区居民的诚信意识,并通过不同途径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乡村地区居民的金融素养以及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其次,应该不断完善乡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大力加强乡村地区网络宽带搭载技术以及网络信号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提高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最后,建设良好的支付清算环境。逐步引导农民使用非现金结算,提高结算效率,充分利用媒体平台,开展一些能让农民看得懂、简单易操作的支付方式进行宣传的活动,使农民能够更快适应信息化方式,降低金融服务在乡村地区开展的难度。

6.2.4 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教育作为国之大计,为国家发展的源动力。乡村要振兴,人才是根基。要不断推进乡村地区人才、教育、科技培育,提高适龄儿童受教育率。加大教育资金投入,为乡村地区教育发展事业添砖加瓦,引进先进的教育设施和优质教师队伍,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回乡创业、反哺乡村等。在乡村教育中,加大科技教育力度以及金融知识的普及,使得全社会共同进步和发展。同时,吸引更多农业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投身农村建设,在这一片广阔天地里实现理想的同时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献出一份青春的力量。

6.2.5 健全乡村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乡村地区金融工作中对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农村居民群体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有大量的渠道获取维权信息,缺乏必要的自我维权意识,尤其是当前数字化运用到金融行业之后。在日常工作中,金融机构应该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去应对此类问题,以符合当地发展特色的手段全方位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努力创建一个健康有序发展且焕发活力的

乡村金融市场。同时,尽可能的为农村金融机构配备适应当前金融数字化发展的硬件设施,有力提高金融服务质量,还应该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相关工作的考核力度,定期披露有关情况,这也是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切实要求。

6.3 研究展望

本文在参考部分相关文献的同时并对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实证方法对理论进行多方验证,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以及非线性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不同维度的研究。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由于构建乡村振兴指数以及相关模型进行分析时遇到不同的难度,再加上本人学术水平有限,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构建乡村振兴指数时,虽然充分考虑到政策性、理论性、数据可得性以及科学性,并参考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指标体系,但是因为缺乏权威官方的相关评价标准发布,相关指数的构建并没有统一的建立标准,希望未来可以有学者就乡村振兴有一个标准的评价指标,在对乡村振兴发展成果进行成效评估时可以更加科学、准确;第二,由于乡村振兴和数字普惠金融都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概念,相关研究的参考文献较少,本文在分析理论基础和作用机理时可能还有相关理论没有提及,有所遗漏,希望后来相关研究者可以继续补充相关理论;第三,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了2013-2020年进行分析,数据时间跨度较短,分析样本数据量较小,没有充分展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长期影响,希望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学者可以将数据量扩大,得出的结论更加有说服力;第四,在使用计量方法时,可以根据不同研究方向选取其他方法,对相关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齐文浩,李明杰,李景波.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收入增长: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农民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16-126.
- [2] 葛和平,钱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J].现代经济探讨,2021(05):118-126.
- [3] 熊正贤,王静,王志章等.西部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融合的路径设计与政策协同研究[M].人民出版社,2020.03.
- [4] 张炎,赵鸭桥,周铝,王奇,冯璐.基于改进 TOPSIS 法的乡村振兴评价及地区比较[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02):207-217.
- [5] 毛锦凰.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的改进及其实证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47-58.
- [6] 吕承超,崔悦.乡村振兴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地区差距与空间极化[J].农业经济问题,2021(05):20-32.
- [7] 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19卷第4期,第1401-1418页
- [8] 贺健,张红梅.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影响研究—基于系统 GMM 及门槛效应的检验[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07):26-32.
- [9] 周利,冯大威.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J].经济学家,2020(5):99-108.
- [10] 张岳,彭世广.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传统金融机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4-26.
- [11] 葛延青.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生态框架及实施路径探讨[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03):32-39.
- [12]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10):65-75.
- [13] 王林辉,胡晟明,董直庆.人工智能技术会诱致劳动收入不平等吗——模型演进与分类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20(4):97-115.
- [14] 傅秋子,黄益平.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68-84.
- [15]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 [16] Aditi Kapoor.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dian economy[J]. Future,2014,56(10):35-42.
- [17] 周广肃,樊纲.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创业选择——来自 CFPS 的数据的验证[J].经济评论,2018(5):134-147.
- [18] 杨伟明,栗麟,王明伟.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基于经济增长与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22(04):83-94.
- [19] 张青,况志华,王焰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青年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J].金融与经济,2021(11):34-45.

- [20] 何宗樾, 张勋, 万广华.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J]. 统计研究, 2020(10):79-89.
- [21] Qian Wang, Jinbao Yang, Yung-ho chiu.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financial efficiency[J]. <https://doi.org/10.1002/mde.3168>. 2020.03.
- [22] Darja Reuschke, Colin Mason. The engagement of home-based business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J]. Future, 2020, 10(3):1-13.
- [23] 孟娜娜, 栗勤. 挤出效应还是鲶鱼效应: 金融科技对传统普惠金融影响研究[J].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0(01):57-70.
- [24] 钟凯, 梁鹏, 董晓丹, 王秀丽. 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01):170-188.
- [25] 星焱.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与“鸿沟”[J]. 经济学家, 2021(2):102-111.
- [26] Beck T, Brown M.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in Emerging markets-Household-Level Evidence[J].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11.
- [27] Malady. Consumer Protection Issues for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in Emerging Markets[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6, 31(2):389-401.
- [28] 黄金增, 畅红琴, 李艳.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提升路径分析—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J]. 管理现代化, 2021(01):12-16.
- [29] 崔凯, 冯献. 数字乡村建设视角下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设计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1, 41.
- [30] 傅利福, 厉佳妮, 方霞, 韦宏耀.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理及有效性检验[J]. 统计研究, 2021, 38(10):62-75.
- [31] R.Nurkse, “Som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 1952(02), 571-583.
- [32] W.A.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J]. 1954(02), 139-191.
- [33] S.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 1955(01):1-22.
- [34] G.Myrdal,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7.
- [35] P.N.Rosenstein-Rodan, “Notes on the Theory of the ‘Big Pus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Latin Americ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61, 57-81.
- [36] 李志平, 吴凡夫. 农村电商对减贫与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1(06):15-19.
- [37] K.S.Imai&J.You, “Poverty Dynamics of Households in Rural Chin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 2014, 09(06):898-923.
- [38] C.von Reichert, J.B.Cromartie&R.O.Arthun, “Impacts of Return Migration on Rural US Communities”, Rural Sociology[J]. 2014, 10(02):200-226.
- [39] 陈兢. 乡村振兴视角下电子商务发展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以广西为例[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08):123-127.
- [40] 朱纪广, 侯智星, 李小建, 许家伟. 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J/OL]. 经济地理: 1-10[2022-03-25].
- [41] 石丹渐, 王轶.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影响因素及其政策促进[J]. 求是学刊, 2021(01):90-101.
- [42] 姜姝.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归”群体的生成机制及其价值实现[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3):140-147.

- [43] 熊正德, 顾晓青, 魏唯. 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基于 C-D 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J]. 湖南社会科学, 2021(01):63-71.
- [44] 张建波, 孙子淳. 促进农村供给服务的纾困之路[J]. 甘肃社会科学, 2021(02):190-197.
- [45] 杨儒凯. 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现存问题及破解路径[J]. 领导科学, 2021(04):86-89.
- [46] 何广文. 全面乡村振兴的金融生态建设[J]. 中国金融, 2021(08):40-41.
- [47]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何宗樾.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经济研究, 2019, 54(08):71-86.
- [48] 郭峰, 王瑶佩. 传统金融基础、知识门槛与数字金融下乡[J]. 财经研究, 2020, 46(01):19-33.
- [49] 谢地, 苏博.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04):121-127.
- [50] 李季刚, 马俊.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关系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1(10):138-141.
- [51] 何广文, 刘甜.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农村金融困境与创新选择[J]. 学术界, 2018(10):46-55.
- [52] 郭国峰, 张颖颖. 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支持农村发展效应研究[J]. 征信, 2021(02):88-92.
- [53] 彭澎, 徐志刚. 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农户的脆弱性吗?[J]. 经济评论, 2021(01):82-95.
- [54] 陈慧卿, 陈国生, 魏晓博, 彭六妍, 张星星. 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41(03):184-191.
- [55] 马亚明, 周璐. 基于双创视角的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路径与机制研究[J/OL].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2(02):3-20.
- [56] 何铁林. 普惠金融赋能农村电商产业升级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11):169-172.
- [57] 田霖, 张园园, 张仕杰.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 GMM 及门槛效应的检验[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4.
- [58] 邢鸿飞, 吕汉东.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研究[J]. 湖北农业研究, 2021(7):31-35.
- [59] 谢琳.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功能性分析[J]. 湖北社会科学, 2020(8):84-89.
- [60] 王胜, 余娜, 付锐. 数字乡村建设: 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J]. 改革, 2021(04):45-59.
- [61] 邹新阳, 温涛. 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与乡村振兴—基于 30 省(区、市)的面板数据[J]. 改革, 2021(04):95-106.
- [62] 冯兴元, 孙同全, 韦鸿.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逻辑[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02):54-64.
- [63] N·格里高利·曼昆. 经济学原理[M]. 德赖登(Dryden)出版社, 1998.
- [64] 德里希·冯·维塞尔.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M]. 1914.
- [65] 黄达, 张杰. 金融学(第四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7: 290-291.
- [66] 陈熹, 张立刚. 激发内生秩序: 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J]. 江西社会科学, 2021, 41(10):58-67.
- [67] 谢文武, 汪涛, 俞佳根.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农村创业?[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0(07):111-118.
- [68] 郭峰, 孔涛等.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与指数编制[R].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2016.

- [69] 谭燕芝,李云仲,叶程芳.省域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评价及其耦合协同分析[J].经济地理,2021,41(12):187-195.
- [70] 田娟娟,梁雨.脱贫攻坚与数字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5:19-26.
- [71] 曹恺燕,周一飞.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现代商业,2019(31):81-84.
- [72] 崔艳娟,孙刚.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1):116-127.
- [73] 杜晓山.小额信贷的发展与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J].中国农村经济,2006(08):70-73+78.
- [74] Unal Seven,Yener Coskun.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Emerging Countries[J].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16,26(3):34-63.
- [75] 康书生,杨娜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效应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2(02):110-118.
- [76] 张兵,李娜.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2-02-23:1-12.
- [77] Nasreddine Kaidi,Sami Mensi,Mehdi Ben Amor.Financial Development,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Worldwide Evidenc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9,141(1).
- [78] Unal Seven,Yener Coskun.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Evidence from Emerging Countries[J].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16,26(3):34-63.
- [79] 韩亮亮,彭伊,孟庆娜.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软科学:2022(02):1-18.
- [80] 蒋瑞琛,瞿艳平.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成、短板与发展路径[J].江汉论坛,2022(02):50-55.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一、发表论文

1. 拜珊珊. 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实证研究[J]. 中国储运, 2021(07):136-137.
2. 拜珊珊.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可持续脱贫的路径研究[J]. 市场周刊·理论版, 2020(82):0096-0097.

二、参与课题

1. 《2018 天水市市级财政专攻扶贫资金》绩效评价项目组成员.

致 谢

2022年五月的兰州没有往年春日的温润，时而黄沙漫天，时而燥热难耐，天气显得格外异常。作为硕士阶段最后一个“仪式感”，酝酿了好久，都不知道致谢该从何谢起，或许是这三年走的太艰辛，以至于想感谢的太多，一时间竟不知道写什么。坐在电脑跟前，敲下了“谢谢”二字，久久无法下笔……

随着毕业季的临近，翻看着以往的相册，发现了许多遗漏的美好与惊喜。在齐云楼1330的两年时光里，承载了我对兰大所有的回忆，看着校园里花草树木绿了又黄，枯了又生，反反复复，见证着走过的每一天。藏在飞云楼旁边的丁香总是春日里开在校园中的第一株花；晚上十一点走在校园里总是有不少人也在披星戴月，向着梦想前进；学校的毓秀湖里有鱼，水草长得很茂盛，小桥流水也别有一番滋味；湖的周围有两座小土堆，种的全是牡丹花，四月底走过那里会闻到浓浓的花香；13楼打扫卫生的阿姨很温和，谦逊而温暖，见面都会很热情的打招呼；齐云楼底下的停车场周围，盛夏时节会开出很好看的花；学习累了，站在13楼窗户看看外面的夜景，学着与所有的不安和解；夜晚在兰山顶上可以看见观云楼，它是兰大最高的建筑物，晚上有好看的灯光；我住在学校最新最高的宿舍楼里，虽然每天宿舍到自习室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心里觉得多走走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也倍感开心；食堂的饭菜算不上多好吃，但是放假回去一段时间竟然也会想念……细细想来，自己在兰大也留下了这么多记忆。

感恩吾师。杨老师带给我的除了学术方面的悉心指导外，还有人生态度上的影响。在完成本文的过程中，由于论文的数据获取较为困难，让我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但是杨老师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信心，让我克服困难顺利完成。老师学术上的造诣很深，看问题一阵见血，精准地指出我们论文中的问题所在，让我对老师佩服至极。生活中的杨老师同样也给我深深的影响，年过半百的老师勇敢开辟新的事业，行事豁达开明，给我们发展和成长的空间，身为“杨家将”的一员倍感荣幸。希望老师日后能够多多注意身体，一切顺利，阖家幸福！

感恩父母。在过往的二十多年里，自认为对得起任何人，唯独对父母很抱歉，我没有那么优秀，让父母可以骄傲。很多时候我懦弱胆怯，无法成为保护他们的伞，总是一味的向他们索取，所有的坏情绪和负能量经常传到他们身上，让他们跟着我一起焦虑。这么多年真的很感谢父母一直坚定的支持我，尽力的满足我的需求，让我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难过的时候永远第一时间给予我温暖，告诉我：“我的孩子，不要怕”。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可以变得更加强大，更有能力去为他们做点事，少让他们操心，同时也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每一天的日子过得安心舒适。

感恩吾友。很难想象那么多崩溃难过的日子里要是没有这些挚友的相伴，我该如何面对后来的日子。首先，在此真心的感谢紫雪、少洁、小岩子、转转、婷、何园的真心相伴，与你们相识并成为好友是我最开心的事情，感谢你们一直坚定的站在我身边陪我往前走，天南海北，虽然我们都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但是心永远都在一起。其次，很感谢读研期间与赵明明、慧慧师姐、宗林师妹、丁博文鹏、小凡相识，在稍显枯燥的研究生生活里你们的出现让我在回忆起这段时光时，充满了快乐与温暖。同时，也很感谢遇到了我的神仙舍友：李楠、任丽源、王静雯，三年时光里我们相处的和谐又融洽，你们身上坚持不懈、积极向上的精神也深深的感染了我，也很感谢在我受伤期间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让我感动。其次，也很感谢师门的小伙伴们，小丽、之立、雯怡、琪琪、文莉师姐、军霞师姐、泽汇师兄、凯隆师兄、敏杰师妹、莹莹师妹、赵鹏师弟，谢谢你们在学业以及生活中的帮助，希望师门的大家发展越来越好。最后，感谢张华、王玮、王楠对我论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以及生活中的鼓励开导，很开心能够在研究生期间认识你们。太多感谢，希望寥寥数字能够表达我万分之一的心情，很多人因为篇幅原因没能一一提及，但是过往的善意我会牢记在心，只希望诸位能够在往后的时光里坚定梦想，勇敢向前，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终将归于人海，再见面时，希望诸位均拥有灿烂人生！

感恩自己。在这里想给辛苦了很久的自己说一声“你辛苦了！”。很感谢自己本科期间坚持不懈的学习获得保研资格，来到兰大；感谢自己没有困难面前低头，选择了勇敢站起来，重新出发；感谢自己永远保持善良纯真的本心，事事以原则为底线，坚信这个世界的美好。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后面的生活里调整心态，活的轻松自在一些。

最后，很感谢经济学院和 2019 级学硕班这个大家庭，很感谢班委的倾情奉献以及同学们的友好相处，祝福大家前程似锦。也很感谢学院诸位老师的辛苦付出，让我们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体验，希望经济学院越来越好，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人才，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同时也希望兰大越办越好，培养出各界的精英，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行文至此，洋洋洒洒，毕业期至，想说的感谢太多，不管怎么表达都道不出我的感激之情。我们来自于人海，终将归于人海，回首望时，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只愿我们不忘初心，坚定向前，终将收获鲜花和掌声！

再见了，我的兰大。莫问前程，但行好事！

2022 年 5 月 8 日

于齐云楼